



MG
K825.2
416

我的
生活
馮
玉
祥



3 2167 7613 2

我 的 生 活

(第 一 册)

馮 玉 祥 著

宇 宙 風 社 發 行

B. 301584



目次

第一章	我的家世	一
第二章	康格莊	一〇
第三章	入伍前後	二四
第四章	河邊的眼淚	三九
第五章	光緒二十六年	四八
第六章	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	五九
第七章	副目 哨長 隊官	七二

第一章 我的家世

我的家世，我生長的環境和我所處的正在急劇變化中的時代，都是我的個性、思想，以及一切行為活動的搖籃。

我的原籍——安徽巢縣竹柯村——我始終沒有回去過。（註：一九三七年春天我纔第一次回返故鄉。）對於故鄉，我知道的雖然很多，但並不具體。我現在所記述的原籍的家世情況，都是小時候從我父親口裏聽來，零碎蓄積起來的。

我的父親本來是個泥瓦匠，名字叫做有茂，一八四五年生於巢縣竹柯村；早年家裏奇窮，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。伯父同三叔當裁縫糊口；四叔做一個佃農，替地主耕種着土地；父親曾一度當過僱工，但後來不久即投身行伍。

祖父的一生，每天都在窮困中掙扎着，晚年生活益發窮困得可憐。一次，祖父病了，家裏一文不名，買藥的錢也無從籌措。父親無計可施，於是跑到巢湖去摸魚，賣得了錢，再買藥回來給祖父吃。去摸魚的時候，往往懷裏揣着一袋「鍋巴」，預備餓了好掬出來吃；若遇到家裏連「鍋巴」也沒有，空着肚子在外頭待一天，是經常有的事。

祖父的病愈來愈重，轉眼到了嚴冬。這時巢湖邊上結了冰，摸魚事實上是不可行了；父親在無可如何之中，就想法子，在冰上鑿一個大窟窿，邊上放一盞油燈，引誘魚望上跳，等到跳上來，他就很快的撿起來。

一天晚上，風刮的很大，雪花紛紛地飛舞着，父親如平常一樣，照例拿着燈，蹲到巢湖裏去捉魚。祖母在家裏照料着，躺在舖上呻吟不已的祖父，一邊却在望着巢湖裏衣服單薄的父親。家庭的生計日益艱難，思前想後，處處都是觸人憂傷的資料。每到祖父呻吟停止，漸漸入睡的時候，祖母就輕輕地走到門口，對着茫茫的雪夜，凝神，直到父親披着滿身雪花回來，她老人家纔能安心。

父親日夜焦慮勞碌，也漸漸地病了；雖然病着，然而摸魚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丟棄。

生活的窮困還不算數，偏又遇着洪楊革命，全家因急於逃難，一生辛勞的祖父就在這時候喪失了他的生命。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裏，不消說，死者的死與生者的生，一樣都是無關重要的。

因為長期在窮困中掙扎，長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，祖母的體力已經漸感不支，並且年紀老邁的人，身體精神本就十分衰頹；姑叔年紀又幼小，人事未更，處處增加了父親的拖累與苦辛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一家人離鄉背井去逃難，的確難爲了我的父親。我記得父親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，往往突然地淚如泉湧。我寫到這裏，停筆凝思，當時我父親談話的悲哀的神色，依舊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目前。

祖母不堪長途跋涉之勞，不得已由父親背負着；小姑小叔跟在後頭，蹣跚地走着。時間久了，姑叔也漸漸地走

不動，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。到了這種時候，祖母只得從父親身上下來。另外又由父親找到一根扁担和兩隻籬筐，將小姑小叔裝在兩頭，挑起來趕路。而祖母只好跟在後頭，踉蹌地隨行。走了不遠，就是一條從巢湖分來的河流橫斷着去路。原來這裏本有專渡往來行人的船隻，可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却連船的影兒也不見了。大家不由得焦急起來，特別是我的父親。後來父親跳下水去，試探了一下，幸虧河水尚不甚深。於是父親用一隻木盆把祖母和叔叔一一渡過河來。正預備繼續向前走，忽然對岸又跑來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神色驚慌，看光景也是剛逃出來的。她們看見河裏沒有船，又不知水有多深，於是更加慌張。這時後面亂兵的擾攘聲已經隱約可聞，她們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過，自己却無法可想，情急之下，就跪在岸上大聲呼喊，要求救命。祖母遂命父親回去，將她們倆渡過來，一同行走。

當天晚上，走到半山中一個破廟裏住下。父親因為年紀輕，覺得和兩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塊，不大方便，於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。這種亂不忘禮的舉措，充分地表現出父親的嚴正和古板的個性。日後我個人的精神生活，受了這類事情的感化和影響亦不小。第二天，剛動身要走，兩個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，懇求祖母收留她們做兒媳婦。因為她們覺得自己的年齡已大，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親戚，長此下去，無論如何不是了局；何況離亂之中，自己的家屬又向那裏去尋？找倒不如就此結合為一家人的好。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，在祖母實在是初不及料，當時就毫不遲疑地婉言拒絕了。但是兩個姑娘却已拿穩主意，一再懇求，跪在地上不肯起來。祖母不得已又去徵求

父親的意見。父親向來正直不苟，何況這事頗有乘人之危的嫌疑，當然更加不肯容納。等祖母的話說完，父親就鄭重而且堅決地說：『無論怎樣，這事萬不能答應。』事情也真湊巧，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兩位姑娘的父母，當時就把兩位姑娘交給她們的父母領走。這兩位姑娘同她們的父母團圓了，歡喜自不用說；父親同祖母少了一層累墜，同時精神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愉快。

這裏以後，全家逃到一個偏僻村落的破廟裏，住了一個頗長的時期。這期間，歷盡了許多艱難和酸辛，吃，喝，穿一切生活需用都無着落。經了若干轉折之後，父親纔投到一家張姓家做傭工。這是父親正式充當傭工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投軍的始點。

張家是個地主，家裏有兩個兒子。老主人渴望他們獲得功名，支持門第，因此在父親未來以前，已經請了一位武術教師在家，替小主人教些石頭弓箭刀槍一類的課程。兩位少爺却和一般的闊少沒有兩樣，一切統統子弟的習氣無不應有盡有。穿的綾羅綢緞，吃的離不了雞鴨魚肉，早晨老不起床，叫一聲，哼哼大半天沒有動靜。

父親生性勇武，酷好武藝，看見小主人放着這樣好的教師在家，不知努力上進，心裏着實惋惜，於是不時在那教師跟前討教幾套；空閒的時候就搬石子，耍弓箭，獨自苦學潛修。教師看見父親窮苦而有志氣，工夫也很有根底，心裏喜歡，加倍盡心指教。這樣練習了一個時期，父親的技術已經大有可觀。

考期到了。父親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應考；不知由於怎樣的一個機緣，父親也得到入場應試的幸運。進

了試場，兩個闊少連射了三箭，一箭也沒有射中，石子不消說也沒有舉起來。下來了，臊得面紅耳赤。結果是名落孫山。平素嬌生慣養，一點苦功也沒有下過，臨事自必當場出醜，給爹媽丟臉，這也是不足奇怪的。父親與試的結果，三箭都射中了，石頭也要的合格，居然及第了。這在他自己也是沒有料到的。久經折磨的父親，這時才覺得稍稍吐了一口鬱悶之氣。

父親考上了武庠，祖母却因此受過一次很大的窘困，說起來也很有趣。原來父親傭工的期間，祖母已返故鄉竹柯村。故鄉雖然並沒有可留戀的地方，然而生活到底比較外鄉容易些。外面人地生疏，生活艱難，再三地考慮，祖母才離開父親回鄉。爲了分在兩下，日子更好過一點。父親及第之後，送報子的星夜到竹柯村報喜。在清代科舉盛行的時候，有人專門靠着報喜爲生，每逢榜張出之後，這般人眯着榜上的一個名字，看清籍貫，即疾驅的拼命跑向目的地去。跑的快了，可以得頭報，多賺些賞錢；若是慢了，成了二報三報，就不值錢了。任何人家的父兄，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訊，誰都樂意掏些賞錢，表示自己的快樂的。但是這次報父親喜訊的報子，可算是生意不佳了。報子到家的時候，祖母赤着腳，挽着褲腿，正在田裏插稻秧，無論如何，也沒有想到這時她的兒子會考取功名。送報的查問了半天，才有人把祖母從田裏找回來。祖母到了家，院子裏已經站滿了人，看見她來了，一擁圍上來，亂嚷着賀喜，大家都說她從此苦盡甘來，吉利話說了一大堆，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。俗語說，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。祖母的艱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大家正在恭維賀喜，吉利話講的起勁的時候，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。

的神經，使她聽了傷心；在一片笑語歡騰聲中，祖母忽然嗚咽起來了。家裏一貧如洗，四壁蕭然，每天兩餐飯都發生問題，拿什麼招待報喜的呢？一樣的喜訊，到了窮人家，便變成了無法應付的難題！後來多虧馮文煥的祖母（我的本家嫂子），察知了祖母的隱衷，趕快跑到家裏，兜了一些鷄子和幾斤米過來，替祖母發賞給那報子。可是報喜的却大大的不高興，經鄰里多方勸解，才勉強打發他走，算解了祖母的圍。

考取武庠，雖然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，可是父親的生活却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變化實含有嚴重的時代意義，決不是偶然的。

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，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不住帝國主義砲艦的轟擊，終於被迫着大開門戶。於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流一湧而入，中國舊有的經濟政治的壁壘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，滿清的封建統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。這一新時代的開始，其徵象就是普遍的農村騷亂與新的政治鬥爭的醞釀和發展。一八五〇年洪楊革命的爆發，明顯地，即是那外來的與內在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革命運動。經過這次浪潮的泛濫以及戰爭的延長與擴大，那些和土地緊緊束縛在一起的人民，至此也不得不離鄉背井，流亡外地。太平軍在廣西起義，不久即連續佔領贛，皖，蘇，浙，等省；滿清軍隊與之轉戰於長江流域，前後達十一年之久。這一期間，東南各省農民四散流亡，其中有的投入太平軍，有的應募而為淮軍湘軍以及其他滿清軍隊；總之，生活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所以一次時代的變動，固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前途，同時也影響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動。不

過這些時代的意義，在當時並不爲參與其間的個人所自覺。父親的由流浪而爲傭工，由傭工而取中武侯，開始從軍，很明顯的正就是這些農民之中的一個例證。他之所以離開農村社會，在他自己看來，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脅與企圖上進心理的驅使，其中複雜的時代與社會的意義，他不消說是絲毫沒有意識到的。

父親取中武侯，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。他最初投身銘軍。銘軍，爲劉銘傳所帶領，故名。他是淮軍將領之一，在晚清很負盛名。父親初到軍中，在差遣隊當差，後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官。

清末，帝制的統治整個發生了裂痕。洪楊之役好不容易平定了，「捻子」相繼發動於安徽、河南、山東、直隸各省。不久陝甘回亂又復爆發。這些事實，正是滿清政府腐化與無能以及慘酷壓迫的結果，因此，不僅激起了漢族的暴動與革命，連其他民族也對它仇視起來，反抗起來了。

陝甘回亂雖然僥倖平復，但其殘餘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。清廷不得已就頒佈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。因此父親即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。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，而且對於士兵的待遇也是豬狗不如的。這樣橫貫數省的長途行軍，嘉峪關不設兵站，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，全是生紅薯，由各人自己背負着。從內地到新疆，一條黃沙漠漠幾千里的長途，本來儘夠人走的了，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生紅薯，總計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，壓在背上，叫人怎麼受的了？這樣的長途跋涉，一天一天，好像永遠走不到頭。一路上，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飢；渴了的時候，仍然是以紅薯止渴。這種生活，不說多天，就是三五天，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，也都有些爲

難了幾天之後，大家已經支持不住，但是終於勉強掙扎着到了駐守地。後來父親告訴我，從這時候以後，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疼。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，遇到一個賣紅薯的，他看見了，立時噁心作嘔，連連不住的吐出酸水，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。

從新疆回來，隊伍開到山東濟甯駐防；父親就在這裏結了婚。外祖母家姓游。第二年生我長兄基道，後來一共生了我們兄弟七個。當時因為生活艱難，兄弟們營養不足，死去了五個——三弟長到很大，後來也死了。長兄出世的第二年，銘軍就解散了。父親就和母親帶着長兄回南，本來預備考試武魁，但後來沒有考成。四年之後，父親重復到濟甯。從這時候起，姥姥就沒有找着；只打聽得她是因為荒亂，幾年之前已流離他鄉。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，曾託人到濟甯探詢過一次，結果只找到一個表弟和一個叔伯舅舅。我母親同我舅舅的乳名，至今我長兄還能清楚地記着。

父親在濟甯沒有久留，即重新入伍隨淮軍至直隸青縣與集鎮。生我的那年，正是父親到與集鎮的次年——一八八二年即光緒八年的秋天。在我出世的前幾個月，朝鮮發生了士兵大暴動，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，並且襲擊日使館。因此中日雙方都派兵馳赴朝鮮，幾至釀成戰端。更遠之前，美政府經李鴻章的介紹，在仁川港與朝鮮締結美韓通商條約。以後法、德、意、奧諸國都先後派遣使臣赴朝鮮，締結修好通商條約。這些都加重並且加速了日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發展。

我出世的那年，祖母已經去世了。當我長兄隨父母回南的時候，祖母還健在着。因為我長兄是在北方生的，所以祖母就給他取個名兒，叫做北寶。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給我命名，父親就順着祖母的意思，給我取個名兒，叫做科寶。「科」大約就是指科舉而言。

後來李鴻章到直隸，淮軍分駐於津郡各屬。於是保定府「五營練軍」開始，父親就到保定府，全家也都搬去同住。因此，這兒就成了我兒童時代的養育之地，成了我的第二故鄉。我現在說話操的是保定府口音，也是這個緣故。

上述家世，正替我埋植了一個艱苦的前途，並且替我打下後來奮鬥的基礎。

第二章 康格莊

在保定府城裏住了不久，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。遷移的動機，主要是爲減輕經濟上的負擔。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，對於人事雖然尙很淡漠，然已漸能認識，並且嘗試着要瞭解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。

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。我們初搬到這兒，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着。大約房主人的境况也很艱難，房子很不好，房間怕只有一丈餘長的光景，房身也非常低矮，父親立起身來，舉手可觸着頂上的樑木。屋內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，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。棹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。客人來了，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。這時父親那種謙容的樣子，看了真令人難過。這與其說是家裏來了客人，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。四圍的牆壁，因爲年代久遠，風吹雨淋，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，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；更因造飯的緣故，炊烟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墨，襯映得滿屋裏黑漆一團。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，一掀鍋蓋，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，簌簌地墜落；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衝，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，弄得滿鍋裏烏黑白造，令人看了無法下箸。平常坐在屋子裏，若稍微留心一下，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滿處飛舞着，地上，衣服上，被子上，無處不是塵屑。這兩間顛簸不堪的房屋，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，會容

睡覺，廚房，餐室，統統都仰賴着它。

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，家裏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，始在康格莊南頭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。這所房子一共七間：三間正房，兩間東房，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間小房間。能夠住這麼多的房間，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。搬家的那天，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興高采烈的呼喊，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慰的。

一天黃昏，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裏坐着談話，母親一手抓着我的手，一手撫摩着我的頭髮，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。一回兒，她對我說：

「科寶，從前你受不了屋裏黑暗骯髒的苦，常常撒腿就望外跑；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，你才沒有跑掉！看看，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？」

母親說話的聲音調愉快而自在，說完了，抬起頭來，望了望父親。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。

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，左耳朵却比較的方短。這大概因為在我吃乳的時期習慣於向左邊側臥，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，沒有功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，日子久了，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，沒有得到平均的發長。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借此拿我取笑罷了。

家裏生計艱難，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幫同大人操作。我七八歲的時候，便有時同家兄到野地裏拔草拾柴。每

天吃過早飯之後，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籃，拿着鐮刀，下身穿一條露着半截腿的褲叉，跳跳蹦蹦的向草地裏進發。這時真可說是我一天中最洽意的時候。自然的幽美，長空的遼闊，在在煽發了我潛伏着的生命的火燄。清脆的鳥聲，唱着生命的讚美歌，委婉而動聽；迎面吹來的微風拂到臉上，一種愉快的感覺，似電流一樣，傳感了我的週身。情不自禁的時候，我就放大了喉嚨，喊上幾段梆子腔，發洩心中的積悶。湊巧成羣結夥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們遇到一起，笑笑說說，跳跳唱唱，那就更熱鬧有趣了。拔草的地方，大都在高粱地裏。拔的是一種黃草，可以用來餵馬，晒乾了，也是一種很好的燃料。

一到收割麥子的時期，保定府附近，衣服襤褸的農夫常常成羣結夥的去拔麥子。這時我也隨着大家同去工作。

農民生活的艱苦，如果不去實際體驗，怎麼樣也是難以想像的。勞動者的苦楚，只有勞動者自身才能夠知道。後來我自己怎麼樣也難以克服的農民性格，都是我過去的生活遺留給我的。這種生活與環境，深切地影響到我日後的思想與情緒，影響到我日常處理事務的習慣，以及我訓練軍隊的方法；同時直接間接也使我必然的傾向革命，並且時時刻刻不忘掉改革勞苦大眾生活的職志。

我現在略舉幾件事談一談。

夏天，高粱快要成熟，桿上的葉子照例須經一次披剝，據說這與它的穀實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。保定府的慣

例，披葉子的時候要敲鑼，一敲鑼，大家都鑽進高粱地裏去，誰披了誰要。每年一到這時候，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顧，專門到高粱地裏去披葉子。因為這種機會實在太難得了。披葉子的苦楚，到現在想起來還使我頭暈。地裏好像一座大蒸籠，一鑽進去，就覺得窒息氣悶。四圍密集着的高粱，一株接連一株，一點風也吹不進來。上頭熱刺刺的太陽晒着，蹲在裏頭，簡直是麵包烘在火爐裏。汗水雨似的滴着，頭上像有一個鐵箍緊緊箍着，胸口像有一團綿花塞着。這種苦，自然不是我自己願意受的；但一想起家裏的情形，又不能不狠着心，咬着牙，強打精神去披。有時從早晨直到晚上，赤着腳，挽着腿，袒胸裸臂，在裏頭披一整天，中間連飯也不吃；因為怕耽擱了時間，葉子都被別人披完了。出來之後，低頭一看，頸子上，胸膛前和兩隻臂膊，都起滿了鮮紅的痱子。由於過度的疲勞，不僅飯吃不下去，連水也懶得喝。頭，耳朵，轟轟地作響，口腔和咽喉裏淤積着一股很厚的苦澀的粘液，一噎上來就要嘔吐。

到了冬天，原野上無草可拔，地裏也沒有可尋找的燃料，於是就到樹林裏去投乾枝棒。所謂投乾枝棒，就是用一根較粗的枝椏，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；冬天樹枝特別乾脆，只要擊中了，就很容易斷落下來。這樣投個半天，落下很多的乾樹枝，收集起來，背回家去，可以燒一兩天。另外我又常常穿楊樹葉。北方楊樹特別多，一到隆冬，樹葉兒完全脫落，遍地都是穿楊葉的方法倒也很巧妙：是用一根細棍，一端削得尖尖的，一端刻一道槽，繫上一條長繩，把削尖的一端戳到葉子上，隨手將上繩索，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。我冬天的生活，大部分是在穿楊葉和投乾枝棒兩項工作上消度過去。

幼時我穿新鞋的時候很少，所着的大都是「二鞋」，說起「二鞋」來，怕只有穿過的人才能道出原委：普通人家，常常把穿得半舊不新的鞋子賣給打鼓的小販，而後經過一番洗刷修補的工作，前後再打上皮包頭；這樣的鞋子，從外面看來好像新鞋似的，其實叫做「二鞋」。穿這種鞋，有一種缺陷，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適合自己的腳，也許小些，也許大些，穿長久了，腳上就會生出毛病。現在我腳上毛病所以特別多，都是因為幼時穿「二鞋」太多的緣故。

家裏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當舖發生關係。父親的薪餉不到月杪不下來；在那青黃不接的時期，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，唯一的門路就是上當舖。大人因為礙着顏面，不好意思上當舖去，每次都是由我同父親的一個僕兵寶玉明外號叫寶老魁的一同去；贖當的時候，也是他跟着我去贖。每月上旬，所當的大都是些整齊的比較值錢的衣服；可是快到下旬，不僅家中隨手應用的什物要拿去典當，就是炕上鋪墊的褥子也要揭下來送進當舖了。這樣剝肉補瘡的勉強支持着，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斷炊，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當的東西來的時候，父親的餉才能發下來。餉一領到手，頭一條事就是贖當。這好像請命似的，一點也不敢拖延；要不然，錢花光了，當也贖不出來，下月的生計可就毫無辦法了。贖當的時候，寶玉明拿着扁担在頭裏走，我在後頭跟着。這時我一面走，一面却在算計當票的張數以及利息的多寡，生怕大人算錯了賬，多付了人家錢。到當舖裏把當取了出來，用繩子捆好，兩人就抬着回家。長袍，馬褂，叉褲，褥子以及各種應用的什物，統統都在裏頭。

當舖在保定府東大街。每逢贖當，東關是我們必經之地。每次到這裏的時候，父親的朋友老遠的就笑着問我：「餉下來了嗎？」

經過這樣的一問，不由得我臉上就有點發熱。有時不等把我應回答的話說完，我就低聲催着寶玉明說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」

說也奇怪，這種羞怯的心理，只有在我經過東關的時候，才顯著的感覺到；一到東大街，特別是快要進當舖的時候，不知怎的，羞怯的心一點也沒有了，代替而來的是一股憤懣之氣，從心裏一直衝到腦門上。

每次進當舖，總要使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苦惱。最可恨的是掌櫃的那副冰冷的面孔。每次走進去，抬頭一望，櫃台後頭站着的，就是那個害貧血病的尖頭鼠腦的怪東西。這時我的心房驀地感到壓迫，跳躍的次數驟然增加，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樣。等到把要當的東西遞上櫃台，自己就如同一頭被宰割的羔羊，只有俛首貼耳，動也不動的在那比成年人還要高過一頭的櫃台旁邊靜靜地靠着；待不上半分鐘，就聽見一種油腔滑調刁吝刻薄的，好像含有槍藥的聲音爆裂出來：

「三百錢能當得了吧！」

每個字眼裏都吐露出一種惡意——就是：「你多嘴，就立刻滾出去！」

頭一兩次，我把東西遞上去以後，還離開櫃台，退後一兩步，仰着臉，立起腳跟，看看他的臉色，希望他能多給我

當些錢。後來，我簡直不敢再望他了。

我幾乎每天要進當舖受這樣的晦氣。那時心裏不禁反覆的想：「這比坐監牢好些嗎？」

家裏日常吃用的米麵，都是在一家雜糧店裏賒取。這家雜糧店的字號，現在我已記不清了，只記得地址在保定府東門外，正對着城門，因此外號就叫「迎門衝」。掌櫃的姓米，人都稱他小米。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，那種精奧巧妙的手段，真叫你不能不嘆服。我們賒用的糧食，都是暫時不付錢，按日把賬目記上摺子，日後再算賬。這樣的辦法，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虧；可是實際上他却大施其剝削手段，比較現錢交易還要賺的多。每次在他店裏取了麵粉，分量總是不夠頭，拿回來一秤，一斤至少要短二兩。至於小米，不僅分量不夠，並且還攪雜了很多的砂子。我們明知他巧妙的剝削方法，但是只有忍受，不敢和他理論。原因就是：我們拿不出現錢來買東西！除了賒取糧食之外，我家日用零錢也在他店裏挪用，這也是叫人氣憤的事。因為在他店裏取的是大串錢，他就弄些小錢攪雜着，我們也看不出來；等到取回家，把錢串拆開來的時候，三個錢的醋，四個錢的油，那些小錢就沒法花的出去，花到最後，剩下的一些小錢只好白白的扔了。到了月杪，餉下來了，白花花銀子再給他送去了。

在康格莊，我的父母戒鴉片時的那種痛苦的情狀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。父母早年都染有鴉片烟的嗜好；這在清末，已成爲一種最普遍的風氣，尤其是軍政界，簡直無人不吸。那時鴉片雖然便宜，可是我父親每月只有十二兩銀子的餉，維持全家日用必需，已經就捉襟見肘，當然難有餘力來負擔一筆鴉片烟的開銷。不得已，父母下了極

大的決心，決計要戒煙。

戒鴉片煙的苦痛，我真看夠了。開始戒的一兩天，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，臥在炕上，像患了霍亂病一樣，呻吟嘔吐，不住的轉側翻騰。他們眼角裏含着淚，清鼻涕不斷的向外流，呵欠，寒噤，連續的發作。端起碗來呷一口水，兩手就顫抖的厲害。一直鬧了三四天，才能稍稍安靜一點，但也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。記得最厲害的時候，他們簡直瘋狂了一般，仰臥着也不合適，坐起來也不舒快，左翻右轉，怎麼樣也沒有是處，那種痛苦難熬的情狀，叫人看了不寒而慄！他們難受得無法可想，就橫臥在炕上，把腿伸出來，令我同家兄兩個人每人拿一根極布用的木棒，各按着一條腿去極，極半天，筋肉才覺得舒展一些，精神也能安定一些，這才勉強合上眼，睡一兩個鐘頭。從這裏，我就深知道鴉片煙的可怕，以後我看見鴉片煙就要發惱，比看見仇人還氣恨，從心裏起一種不可遏止的憎惡之感。

父親信仰佛教，到晚年尤其誠篤。家裏正房的中央懸着一幅白布繪的觀世音像，兩邊蒙着白布幔，中間只露出一塊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；從這空隙處，僅能看見觀世音的下體。黃布幔的上端，還橫蔽着一條黑布帘，底下拖出兩條綠布飄帶，襯托得異常精緻。每到初一十五，或特別的祭節，父親即穿上開叉袍子，戴上大帽子，着上靴子，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禮。每次看見他行禮，我心裏總覺着奇怪，心想這是什麼事呢？有時父親行完了禮，仍不起來，扒在那兒，把頭伏在地上，嘴裏咕哩咕嚕不住的念誦，聲音特別微細，辨不出唸的是些什麼話，弄得我莫明究竟。有一

次我實在困不住了，輕輕地走到他背後，側耳偷聽，才聽見了下面的一段話：

『祈求老佛爺大發慈悲，救苦救難，保佑一家平安，升官發財，一順百順。』

唸完了，就在地上朋朋的連磕三個響頭。

他在家裏，閒常沒事就在炕上打坐，盤起兩條腿，像彌勒佛一樣，手裏拿着一串佛珠，來回沒遍數的數着。一天下午，他從營中回來，又到炕上打坐，這時母親突然叫喊起來：

『蛇！蛇！』

我驀然一瞥，一條七八尺長蠟黃色的毒蛇，正沿着南牆根爬去，駭得母親手忙腳亂，慌張地向外跑；我也未及細看，隨着母親一同跑了出來。

父親真不愧爲佛門弟子，的確有點鎮靜的工夫；母親驚惶失措的呼喊絲毫沒有擾亂着他，他依舊安靜自在的坐着，慢慢睜開眼睛，向那條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，而後不慌不忙的站起來，穿上大袍子，戴上大帽子，着上靴子，開始向那頭蛇焚香叩頭，同時嘴裏還不住的唸着：『阿彌陀佛！』

原來他竟把這條毒蛇當做了財神爺。財神爺居然進了家，他相信完全是他終年祈禱，感動了佛爺慈悲心腸的緣故；他的虔誠信佛，不是白費的了。

從那天起，他就在連接正房東端的兩間小房裏設立了一座財神牌位，每天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爐香。每到初

一十五，替佛爺上供；初二十六，就給這位財神爺上供。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裏過日子。

戒烟以後不久，母親就病了。那時我年歲還小，她生的什麼病，也弄不清楚，只記得她因為家裏裏的麵條吃着沒有味，叫我到保定府城裏玉美軒去端麵條，並且順便請來一位姓宋的大夫。這位先生據說是專門針灸，到了家裏，醫生照例必須有的「望」、「聞」、「問」、「切」四步手續也沒做，他就從腰裏掏出一根九寸多長的銀針，也不消毒，也不揩拭，對準母親的胸部一直刺了下去，刺得很深很深，看去快到後胸，停留了好久，才拔出來。——怎麼能刺進胸口裏去呢？真是怪事！直到現在，我還莫明其妙。

俗語說：「炕上有病人，不得不信神。」我那時年紀小，每天受着迷信空氣的薰陶，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親的病快好，於是許多迷信的勾當我都願意扮演。比如在家裏燒香禱告，遠遠的向着高莊的劉爺廟叩頭，我都虔誠的照做。往往搬一塊瓢頭放在面前，就在那上面叩頭許愿。

我在院子裏從黃昏一直叩到半夜，四肢漸漸的不能動了，腦袋疼痛難忍，像要漲裂似的；前額上突出了一大塊，好像另外生了個腦袋。母親的病，不消說並未因此減少分毫。對於神的信念，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動搖。庚子年義和團起來，八國聯軍打到保定，劉爺廟遂被毀掉，它的無邊的法力，可惜一旦竟降伏於洋大人之手！可是聽說現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來，恢復昔日的盛況了。

母親死了，照北方的風俗在家裏停靈三日，「接三」的那一天，才到安徽義地找了一塊地方安葬。說起義地，我

還記得當日家裏的悲苦情況。母親死後，家裏一文不名，我同家兄終日啼哭；父親雖幾經籌思，也是一籌莫展。後來實在無法可想，才決定葬到義地裏去。當時假使稍微有一點辦法，是決不會把母親埋到那裏去的。以後我一起起這件事來，就覺着如芒在背，坐臥都感到不安。民國十一年，我從河南回到保定，才把母親的靈柩從義地起出來，同父親的靈柩合葬於保定府西北新塋。幾十年來的宿願，這才得以償還；但這也恐怕是多餘的罷？

我的家庭給與我的影響固然很大，但同時整個的康格莊的環境影響我的地方亦復不小。在這裏，我覺得也有一述的必要。

康格莊的居民大約不下二百餘家。討飯的人雖然少見，但大部分都是窮苦的。他們大都以農爲生，其中以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爲最多。每家土地類多在十畝上下。做生意的人這裏很少；販賣油鹽醬醋，算是村內唯一的營業。兒童玩具以及婦女用品，在康格莊都不容易買着。村裏不到過年的時候，不見穿新衣服的人。在平常，人民的衣着十九都是藍縷不堪，滿身補釘。綢緞綾羅不消說這裏牙根兒就沒見過；就是洋布之類，這裏也很少有人穿。

吃飯的時候，沒見過誰家特意做一碟炒菜，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。大葱，蘿蔔，鹽菜，是他們經常的菜蔬。有些人家竟連鹹菜也捨不得吃，只臨時泡點鹽水吃。麥熟的時候，才有一兩家吃麥子麵的；平素吃的都是高粱，棒子，小米等雜糧。

談到房屋，稍微講究一點的人家才在屋頂上抹一層石灰，所謂「石灰房」，爲村內較好的屋舍。瓦屋全村裏

只有二三家，其餘多是一些徹舊破壞狼狽不堪的屋子。有的人家連院牆也建不起，僅用秫秸紮成稀疏的籬笆，圍做院牆。院牆內外，破亂的瓦器，瘦小的牲畜，是唯一的點綴品。到了冬季，特別是寒風凜冽的天氣，村內到處呈現着一種衰殘荒涼的景象。間或有人從村首走過，穿着臃腫的破棉衣，瑟縮着身軀，慢慢移動着，看來簡直像一個影子，像一個鬼魂。這時一兩隻狗吃驚地叫起來，聲音也是那樣的寂寞，那樣的淒涼。這種現象，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樣的乾枯與貧乏。

村裏遇有喜慶喪祭的事，平常的交情是隨一百三十錢的禮（合現在三個半大銅元）交情深厚的，隨二百五十錢的禮（合現在七個半大銅元）待客的席面，有名的是「白菜豆腐泡席」八大碗一齊端，——白菜，粉皮，粉條，豆芽，豆腐泡等。飯是擱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飯，吃時冷不小心，就會把牙齒震掉。我們在這裏住了十餘年，只吃過一次葷席，然而那所謂葷席也者，也不過每碗裏蓋上兩三片飛薄的豬肉而已。

人民除了完糧之外，很少和政府接觸。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，人民也不關心政府的作爲；兩方面只是一面收稅，一面納糧，此外再無關係。保定府距這裏雖然僅只二里，然而村民對於那裏的城市文明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，有時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。這裏聽不到關於政治的談論，也聽不到列強侵略中國的痛史，外面種種巨大的時變，如同隔成兩個世界，很少波動到康格莊來。

政府開徵錢糧的時期，里正一手提着鐮，一手拿着木槌，從村西頭一直敲到東頭，口裏大聲嚷着：

『完糧哪！忙銀子，每畝地四百六！』

村人聽見這樣的鑼聲，並不見得馬上就去完糧。他們只沒精打彩的走到門口，漠然地對里正望一眼，很快地就縮回身子，只當沒那麼回事一般。一直到了最後的限期，延無可延的時候，他們才三五成羣的到城裏去繳出他們的血汗錢。

他們整年忙碌着，愁苦着，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戲。自然，這樣的機會，也是非常難得的。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戲劇有「哈哈」、「二簧」、「梆子」、「老調」等數種。這類的戲劇，對於我們村民的影響非常深大，我們的人生觀，社會觀，都由此中漸漸地陶溶出來。我自己最愛看「老包斬陳世美」的一齣戲。每逢看到陳世美強派韓琦迎路去殺他妻子的時候，我的兩手總要握得緊緊的，全身的神經緊張起來，心裏罵着：

『喪盡天良的陳世美呀！』

這樣，直到全齣演完，陳世美被鏢，我的一口氣纔可以鬆下來。這時心裏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痛快。但隨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，心裏想：假如沒有鐵面無私的老包，這位喪盡天良的駙馬爺，誰敢鏢掉他呢？那麼，他妻子的冤屈到幾時才能申雪呢？世界上真有老包這樣的官嗎？假如沒有，這些罪惡和冤孽有什麼法子可以解除呢？每次看完戲，我總要這樣興奮地自問着。

受這齣戲的感動的當然不止我一個；上廟燒香的人，尤其是那些老太太，在燒完香回家的時候，一手拿着帶

士的油條吃着，一手掠着頭髮，一路上還不住指手劃腳的大罵陳世美。

此外溪皇莊拿花得雷，也是我最愛看的一齣戲。故事是花得雷爲非作歹，強橫豪霸，張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；幸虧褚彪老英雄肝胆義氣，用盡心計，叫俠女張桂蘭等巧裝歌女，爲花得雷祝壽，賈良等乘隙而入，裏應外合，一戰將花得雷拿住。

那時我常常想：「以後我長大了，不能做老包，也要做個褚彪才行。」我一生疾惡如仇，這類戲劇給我的影響實在不小。

離開康格莊後，隨軍飄流各處，再不會回去住過，然而這裏的一切情狀，我一經回憶，依舊宛然在目，歷歷不爽。這是我幼年時期的生長之地，它給我的印象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第三章 入伍前後

我的童年時期，一直在窮苦中掙扎着，但其間也曾有過一度學塾生活，不過爲時不久，就又不得不丟棄了這個幸福，走上長征之途。

一八九一年的秋天，我開始到學塾裏讀書。這在有錢人家子弟看來，當然是一種兒童應享的福利，絲毫不覺得稀罕的，然而在我，家庭狀況是如此的艱苦，却把它當做一個天外飛來的福音。

父親是個因爲沒受學校教育而飽受痛苦的人。他不識字的痛苦生活，使他深切的希望着：無論自己的經濟狀況如何窘苦，自己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們有上學讀書的機會。家兄基道便在父親這種願心之下，勉強入了學。

那時還都是些「子曰」「詩云」的私塾，現代的新式學校，不消說還沒有。先生的束修，每年纔六吊京錢，合現在三百個銅元，父親常常對家兄說：

『北竇，咱家裏可不容易呀！你上了學，要好好的用功，才對得起我們。將來有機會我再替你補兵，那時就休想讀書了。』

家兄於光緒十二年正月入學讀書，到了第六年即光緒十七年九月間，他即補上騎兵之缺，吃一份馬糧，每月

關得七兩二錢銀子，除養馬外，頗可補助家用；他的學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，總計家兄上學共祇五年零九個月。可是這一年的束修是已經繳給先生了，當然不能退回。算起來，下餘尙有三個月；於是由我頂替了他，去補滿那三個月的期限。就這樣，我得到入學讀書的幸福。

我平素羨慕慣了有錢人家子弟出入學塾的生活，心裏渴望着自己也能有這麼一天。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學的時候，心裏又不免忐忑不安起來。那快來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腦子裏盤旋着，使我又是高興，又是害怕，一連興奮了好幾天。

那天父親帶領我去上學，見了先生，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頭。父親說：

「這是你老師，快給老師磕頭。」

我恭而且敬的磕完了頭，就坐到預先爲我安排好的坐位上去。書房裏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。霎時間，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了新的生命，許多美麗的希望在我眼前閃爍，我小小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和幸福。

先生姓陳，六十多歲，是保定府新安縣同口人，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。他雖然是我開蒙的先生，但除了記得他愛用旱烟袋敲我們的腦袋而外，留給我的印象却並不很深，這倒是很奇怪的。我開始照例是唸百家姓和「人之初。」初次捧到書本，每個字對於我都是生疏的，它們在我眼裏亂跳，使我沒法把握。捺下心思唸了半天，才背得出幾個字，但也非常生硬，老是不成腔調。至於那字是什麼意思，那句怎樣解，不消說更是不知道了。

唸了三個月，就到了放學的時期；這時我住到父親的營盤裏自修功課。

在營中，每天的功課是寫字認字，溫習舊課。這期間給我影響最大，留給我印象最深的，要算營中的一位買少書。我那時年紀小，模倣性特別大。賈少書的一言一動，我都覺得有與衆不同的地方；尤其那一筆優秀的書法，和他的豐富淵博的學問，更加强了我對他的敬佩仰慕之心。他成了我的模倣，我的典型，事事我都要學他。那種熱烈的情形，真是少有。每天我跟着他認字寫字，聽他談書說理，心裏感到萬分的愉快。他對我也特別認真教導，在短短的歲月中，我有了很大的進益。從此我對於讀書的興趣，一天天濃烈起來。

我每天練習寫字，可是買不起紙筆，於是就用一根細竹管，頂端紮上一束麻，蘸着稀薄的黃泥液，在洋鐵片上塗寫。後來聽父親的朋友劉賀堂告訴我，說在方輒上也能練習寫字，並且比洋鐵片還好，所以我就改在輒上練習楷書。這樣，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經濟了。

父親人事的關係愈複雜，經濟方面就愈感到拮据，每月十幾兩銀子的收入，無論如何是不敷支出。這時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把我也補上兵額，每月多領幾兩銀子，補助家庭的用度。

保定府五營練軍，是有名的「父子兵」。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，由兒子頂名補缺，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，是很難補進去的。有時即使一年半載能出一個缺，就有許多人來爭着補，各方面託人保荐。所以我補了幾次，都沒有補上。

父親境况困難，他的同營友好都盡情明悉，但彼此都是窮困中掙扎的旅伴，除了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外，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記得那時他們常對我父親說：

「秀公，等着吧，等老大老二年歲大了，您就用不着發愁了。」

有一次，營中出了一個缺額，外人還都不知道，管帶苗大人就說：

「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。」

旁邊人就問：

「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？」

這一問，苗大人也怔住了。接着那人就說：

「讓我問問去。」

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，就攔了時間，缺額又被旁人搶去，所以他隨即說

「我知道，用不着問。」於是他就隨手寫了「馮玉祥」三個字。

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「基」字的排行取的，家兄叫基道，我叫基善。這次補兵，因為苗大人隨便這一寫，以後我就沿用下去，沒有更換本名。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。我補兵的這年，是光緒十八年，西曆一八九二年，我纔十一歲。

補上兵之後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，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，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。這在保定府，叫做「恩餉。」

第二年，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裏繼續讀了一年書。馬先生只有三十多歲，年輕性燥，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。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；因為那種嚴厲暴躁以及糊裏糊塗讀死書的辦法，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。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，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，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，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；上學讀書，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。

到了年底，由於環境的逼迫，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；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，一共只有一年零三個月。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，便這樣匆促的告終。然而這段生活，我却永遠不能忘記。

十二歲這年，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。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，身高足有四尺七八，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，我還高他一寸多。這年春夏之交，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，傳染迅速，死亡極多。後來越是蔓延，越是厲害，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，出了個主意，要調軍隊進城，轟打瘟神。那天絕早的時候，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。我們都穿着滿身雲頭的軍衣，與高彩烈的去執行這個奇怪的職務。進了城，隊伍分做若干排，每排十人，每走過一條胡同口，就碎碎地打一排槍，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，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。那時我就有忿恨外國人的心理，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，不是好東西。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發點，當然只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。這一天

我們走到北門，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，我看見了，不由得十分厭惡；就托起槍來，瞄準福音堂的上半部，砰砰打了兩槍，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，心裏覺得很痛快，揩起槍來，回頭就走。從這種幼稚的行爲上，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衆的情緒。

晚清的時候，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：一是鴉片之戰，一是甲午之戰。前者是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砲，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；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，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，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，可以說大部分都由此釀成。

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；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。朝鮮事變甫起時，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。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着。一回兒說皇上不願打，一回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。一般軍民對於日本，更有許多懵懂愚昧的估量，簡直荒謬可笑。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，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，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。命令剛到，官長尙秘而不宣；到了下午，方始集合目兵講話，宣佈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，囑咐大家準備一切，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，命令一宣佈，不管晴天一個霹靂。同伴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閒的生活，不要說對國外作戰，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，驟然間聽說要向大沽口開拔，抵禦日本兵，大家立時駭得失神失色，十分恐慌。整個的下午，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，七嘴八舌，嘈雜不休。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裏，指手劃脚的瞎猜胡說；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，來回的走着閒談；有的躲在牆

角裏唉聲嘆氣；有的坐在板凳上撇嘴咋舌，種種奇形怪狀，不一而足，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劇，叫人看了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氣。家庭方面，聽說隊伍即要開拔，都紛紛到營中探詢；一探聽，果然屬實，回去的時候，也有拭眼淚的，也有垂頭喪氣的；還有些家長們走到營門口，大聲地對他兒子嚷着：

『小仁，你可不能去呀！家裏就剩我自個兒啦！萬一有個好歹，可叫我怎麼着？』

這天晚上，大家睡在舖上，好似熱鍋上螞蟻一般，滾過來，翻過去，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；第二天起來一看，大家的眼睛都腫得像桃子一樣。

怪劇接着出演了。

這天早晨開拔，情形就如杜甫兵車行所描寫的一樣。軍隊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，忽然看見當地的男女老幼——同營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們——手連着手站在路旁，一直排了三四里路，哭天叫地的送行。我親眼看見一個老太太，拉着她兒子的手，淚流滿面，嗚咽不已，死也不讓她的兒子成行。這樣的情形，觸眼皆是。從早晨直到正午，奇哭怪啼，聲震雲霄，只是不肯罷休。在不明底蘊的人看了，一定會以為是誰家大出殯，所以驚動這麼些人來哭送；決想不到這是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往大沽口警備，去抵禦敵人，為民族爭生存，為國家爭光耀。原來他們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，就是陷入坑，如今去了，一定不能復回的。所謂國家觀念，民族意識，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；至於這邊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中日戰爭，意義有多麼重大，不消說更是絲毫也不懂的。這種可悲可惱的

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？我敢肯定的回答：這完全是專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結果。

我們的軍隊開到大沽口，日本軍艦正在對岸二十里名叫攔沙崗的地方「掛口」；這攔沙崗是多年海沙淤積而成的平地，在這兒開炮，正好轟打大沽口的炮台。我一到這裏，看見這樣被威脅的情形，就感受很大的刺激，心裏想：「今後我不當兵則已，要當兵，誓死要打日本，尺地寸土決不許由我手裏讓日本奪了去！」現在看到我們國家民族所處的境狀，再回想我那時的豪志，一方面固抱有極大的隱痛，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堅強，精神愈加奮發起來。

這次戰爭的結果，中國大敗，旋即停戰，議和於日本馬關，清廷特命全權大臣一等爵毅伯李鴻章前去出席。和約成功，中國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，給與日本種種利益，並把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割讓。日本獨吞了這樣大的一塊土地，立即引起歐洲列強各國的嫉妬，特別是帝俄，那時正銳意侵略南滿，對於這事決不甘於默認，所以馬關條約剛剛簽訂，帝俄即聯合德法向日方交涉，將割地強行索還中國，由中國再出三千萬兩以爲贖價之費。由此遂種下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的根苗。

和議進行的時候，我們的隊伍正奉令修築大沽口炮台。那時我年歲尚小，抬不動土，白天除做些雜務外，就幫着掃掃土；夜間隨同父親巡營，整天過的都是軍隊中的生活。

李鴻章畢竟不愧爲一位深通洋務的大臣：爲時不久，北洋海軍造船所，已在他的擘劃之下宣告成立，炮台上

也新從西洋購來了十幾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。政府迷信大刀，妄自尊大的心理，至此可說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。炮台修了二年，才告成功。工程的偉大，建築的堅固，在當時的確稱得起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。不幸後來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列強逼迫中國將大沽口炮台拆燬。深可痛惜！

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，頗有幾件事情可寫。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。那時駐守大沽口的各隊伍中，都招有大量的新兵。這些新兵，年紀輕，見識淺，又沒有受什麼訓練，因此有些油滑奸詐的老兵就想盡方法加以欺騙恐嚇，從中獲取利益。老兵常常故意對他們說些恐怖的事，無中生有，張大其詞。一回兒說：『日本兵在對面掛口了！』一回兒又說：『日本兵在對面一開炮。我們大家都成爲碎粉，一個也別想活！』又說：『每月三兩三，就賣了我們的命，太不值得！』他們整天在新兵耳朵裏這樣嘀咕，說得那些新兵們恐慌萬狀，都要想法子溜逃。要溜逃，白天是沒有機會的，必得在夜間。那時他們的衣服用品，一件也不能帶，只能赤手空拳的逃走。於是留下的東西都由那些奸詐的老兵得去，賣成了錢，就買肉來燉了吃，一邊吃着，一邊笑罵那些無知的新兵：『冤大頭！好好的兵不當，要溜逃！東西也不要了，給我們吃燉肉！』罵着，笑着，吃着，津津有味。回頭又用同樣的方法去欺騙恐嚇別一批新兵，把他們嚇跑了，於是老兵又大吃燉肉。

有一次颶風襲來，立刻發生海嘯，大風大雨，翻江倒海。海浪拼命的望陸地上奔騰傾注，低窪的地方都成澤國。那時有位曹總兵，統帶着二十多營新兵駐在大沽口的雙橋，那是一個窪地，在巨風駭浪的猛襲之下，立時水深二

三十尺。那些沒有多少訓練的新兵一個個都慌張亂逃，也不看清方向，也不辨別高低，只是你擠我推，一個勁的亂跑，越跑，水越深，結果二十多警人都慘遭滅頂，一個也不留。長官沒有周詳的籌劃，士兵沒有良好的訓練，其危險有如此者！

那時駐在大沽口的各軍，都毫無軍紀可言。官長以及士兵不受約束，荒唐百出。那兒的街市有東大沽和西大沽，都相當的繁華。士兵們就隨便上街逛窯子。在此駐守的還有個之字營，士兵都是直隸錦州人；我們的練軍則都是保定人。爲了逛妓，兩方面發生衝突，一次二次的打架，結下了大仇恨。有一次因爲爭風吃醋，又打起架來。當時練軍人手多，又都長於武術；之字營在場的人少，武藝上也不能相及，即被練軍痛打了一頓。之字營的弟兄吃了虧，氣憤得不得了，跑回去邀集夥伴，打開了倉庫，拿出槍彈來。練軍這邊也不相讓，立時兩邊排陣對壘，準備大打。後由韓協台和羅鎮台出而調解，費盡心力，方把一場風波平息下去，但兩方打傷的人已經不少了。這件事鬧了出來，當地的報館（那時初有報紙，辦報的人往往藉此爲要挾圖財的工具）覺得有生意可做，就聲言要把事情起稿發刊；直隸總督王文韶以此事太礙體面，急得不得了，派人去和報館疏通，結果是送報館二千兩銀子了事。

到了一八九六年，五營練軍方由大沽口開回保定原防。這時我才正式入伍，開始受軍事操練。在兵營中，最難得的是好長官好頭目，若是能遇着學術兩科兼優的熱心長官，那就是士兵們最大的幸福。我的最直接的長官是正目劉賀堂和哨長王春。他們兩位教導士兵，真可說循循善誘，無微不至。事無大小，他們無不一一詳加講解，尤能

處處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，按部就班的教練，非常認真。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內，覺得確實得了他們極大的益處。不久，我們的隊伍又開赴安肅縣「拉撥子」。所謂「拉撥子」就是巡防地方，維持治安的意思。我們的隊伍開到安肅縣，當地士紳都派人來招待，並且請我們吃酒。一天，一家酒商宴請我們，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劇。我本來不能喝酒，但這天同伴們却故意同我開玩笑，堅執地說我會喝酒；有的人又用語激我，說我喝半斤十兩不算一回事。大家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專門對付我一個人；我那時年幼無知，又却不過情面，一時把不住主意。我是初次喝酒，一點經驗也沒有，既不知酒的分量，也不會取巧藏掖，每次都是一口喝乾杯。每喝一杯，大家就在一旁喝采，叫號。越喝，他們越叫；越叫，越不由我不喝。這樣一連喝了幾杯，掌櫃的以爲我的酒量真很好，於是拿出頂上等的帶漿酒，要我喝個充量。當時我的神經怕是已經麻痺，也辨不出什麼滋味，只是糊裏糊塗的喝下去，也不知喝了多少杯。喝到散席的時候，酒力突然衝上來，眼前一陣黑，四肢軟弱無力，已經再也不能支持。大家七手八腳地扶持着，才把我跟踏地送回營裏去。幸虧離營不過百步，路上倒沒有出什麼意外。次日，渾身發出透明的水泡，小的如黃豆，大的竟和蠶豆差不多，難受了好多天，精神也萎靡到了極度。從此之後，我深知酒的可怕，決心不再喝酒，而且事實上也是看見酒就厭惡，遇有宴會，連杯也不去動。一般人都說我矯情，其實那裏知道我有這個底蘊呢？

在安肅縣，我新認識了幾位朋友，年歲都與我不相上下。他們有的在當地團練上服務，有的在鐵路上當警察，也有的正在修築車站上的站台。我們「拉撥子」的工作，本來很清閒，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，簡直可以說再

沒有別的事可做。那時軍中紀律也很鬆弛，沒到自已值班的時候，儘可隨便在外頭溜躑。我是個初涉足社會的少年人，好奇與好動的心理，整個把我支配着，一有空暇，我就愛找那幾個朋友去聊天鬥趣。一天晚上，大家正談笑得起勁，朋友中的一個忽然站起來，拉着我的手說：

『走，咱們扣寶去！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。

這一套，在他們是玩慣的勾當了；唯獨我却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，受了懲戒之後，心裏又是恐懼，又是覺得新奇。就在這樣遲疑不決的情況下，拉拉撒撒的被拖到賭場裏。我對於扣寶這門徑，一點都不懂，下注也不會，籌碼也不會擺，坐在那兒，隨着人家雲天霧地的賭下去，賭到半夜，就輸了十幾吊。起初尙想撈一撈，希望能夠贏回來，怎麼也不願離開坐位；那寶盒上好像有吸鐵石一樣，緊緊地把我吸住——兩眼直瞪瞪地對它望着。那知弄到後來，好像在爛泥坑裏掙扎，越掙扎，越爬不上來。看看沒有希望了，只好打了個呵欠，伸了伸懶腰，苦笑着離開那兒。一路上越想越追悔，越想也越焦急。輸了這許多錢，到那裏弄來還賬呢？還不出來，又怎麼樣應付呢？這天回去的太晚，生怕父親追究，于是又預先編好了一套謊話，準備把事情掩蓋過去。——原來一切惡習，都是連套着的，有了這樣，自然有那樣，用不着壞朋友一一教唆。至今思之，猶使我不寒而慄！

幾十吊錢！這樣大的一個數目，一時我是無論如何也還不起的，於是想出了分期付款還的辦法，商得對方的同意，每月八百五百不等，陸續的支付。如此，一直鬧了三年，還有人同我要賭賬。這一次糊塗勾當，可真把我害苦了，三

四年中，弄得我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每天都逃不脫那些賭博鬼的糾纏。從此我痛切的覺悟到，交結朋友，關係一個人的前途實在太大，非得小心謹慎不可。

我經過這些刺激，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說。回防後即約束自己，向讀書和修養方面努力。

我過去因為唸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，又在營中受賈少書很多的指教，因此普通的文字頗能粗識一些。每逢操練餘暇，自己就愛看些武俠小說，一半是爲的看熱鬧，一半也是企圖多識些字。我看的第一部小說是封神演義，其次是坊間流行的繡像彭公案。初看時半懂不懂，只管囫圇嚥下去；讀完一遍，從頭再讀，讀長久了，書中大意也漸能領悟。但字的意思和音讀，有許多依然摸不十分準確。以後接着又讀施公案，這是我最初自動閱讀的三部書。那時我們的正目劉賀堂——別號叫做劉老喜——專門愛說三國演義。一到他說的時候，很快的就圍上一大堆人，聚精會神的聽着，連咳嗽也不敢大聲，自然，我也正是這些聽衆之中最熱心的一個。每聽到張翼德大戰長板橋，趙子龍大戰長坂坡，樂得我心花怒放，恨不得手舞足蹈。於是又引起我對於三國演義的興趣，立時借了一部來仔細閱讀。初看的時候，只見生字連篇累幅，在眼裏亂跳，用手指按着，逐字逐句的慢慢讀，鬧半天還摸不着頭腦；不過我咬着牙，耐着心，隨時隨處向人家請教，我終於把它讀完。

營中新認識的朋友，大都會幾套拳。我的一位頂要好的朋友，是同噲的馬老殿，他的拳術極好，在保定府稱得起第一。他爲人十分和易，平素同伴們在一起，大家最愛同他鬧着玩，有時甚至動手動腳。每次這樣的鬧時，他老是

笑着讓開，有時也說一句「鬧什麼！」總不肯和人家打鬧。日子長久了，我心裏却有點納悶：「爲什麼他老是不還手呢？」一天，又有人向他動手動腳，他又是照例一笑讓開。我就忍不住問他：

「人家打你，你爲什麼老是不還手？」

他含着溫和的微笑回答我說：

「他們打我幾下，不要緊；我要是還手，他們可受不了。」

我聽到他這話，立時恍然領悟：工夫是愈練愈爐火純青，愈練愈能使人有涵養的。地裏空蕩的穀子，總是高昂着頭，洋洋自得；但充實豐厚的穀子，却總是低着頭的。

每次關餉之後，我總喜歡花幾文制錢去吃一頓大餃子。這時我情願多跑幾里路，繞過東關，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靜的牛肉餃子。這餃子舖是開在一家當舖的門洞中。我爲什麼要跑這麼遠，吃一頓餃子呢？說起來倒也很有趣的。

原來這位平老靜曾在當舖裏當過一副包金鑰子，後來贖當時（正是年三十的夜間，）不知當舖夥計怎麼弄錯，居然還給他一副真金鑰子。他拿回家去之後方才發覺，深怕因此逼出人命，於是毅然決然把鑰子送回。這一來，使當舖老板意外地驚喜了一場。除當時給他送了一塊「拾金不昧」的匾額之外，並把當舖的門前讓他開了一引餃子舖。市井貧賤之中能有這樣的正直君子，的確令我欽敬。我覺得能夠在這樣的人物所開的舖子裏吃

一頓餃子，也是一件光榮的事，就是多花一些時間，多走幾里路，我也甘心情願。除了這一點之外，平老靜還收容着很多習武藝的徒弟，刀槍棍棒，應有盡有。這也很能吸引我這個正在充滿着習武狂的小小的心靈。可是別人却不了解，因此都喊我「老冤」。我也只好報之一笑罷了。

滿清的腐敗，不僅限於政界，就是軍界亦莫不如此。那時軍營中每到初一十五，有所謂「上衙門」這一個老套。到時各級官長都穿上袍子褂子，着高底緞子靴，戴着紅纓帽，騎着馬——文的文打扮，武的武打扮——一早上衙門。我因為個兒大，在營中當一個大旗手，所以也幸能參加他們這個勾當。初次看見這一套，總覺得很奇怪，心裏想，這是幹什麼呢？大概是議論軍機大事吧？不然，也是討論地方上的政務，或是各部隊相互間的重要事情。那知道不久我就發現這種猜想完全不對。原來他們那樣鄭重威嚴的到了衙門裏，大家一見面，不過彼此把腿一彎，互相請一個安，就同木偶一樣，站在旁邊再也不動了；俄頃，大家便出來，重復上馬，一溜烟飛奔走散，有的下小館子，有的去隨便玩耍，什麼事也沒有了。他們把這件無聊的事，做得如此鋪張，如此鄭重，我覺得真是滑稽到了極點！

就因為「上衙門」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變。

第四章 河邊的眼淚

我們的軍隊，從大沽口撤回保定的第二年，父親接連着遭遇到兩次不幸的事變，使我們全個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淵。

一天，我正在營中讀書，父親的護兵忽然驚惶失色地跑來，見了我，急忙地說：

「快點兒回家，大老爺墜馬受傷了！」

我一聽這話，覺得眼前掠過一陣黑影，一時也未及細問原委，即匆促的走回家來。這時父親正躺在炕上呻吟。

原來這天是陰曆二月初一日，又是「上衙門」的日子，父親照例循着營中的規矩，戴着大帽子，穿着馬褂袍子，騎着馬，到協台衙門裏去。不料剛走到城門洞間，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，全身仰翻，父親的右腿被壓到底下，等到人家救起來一看，右腿迎面骨被馬籤軋破，約有一寸多闊的一個傷口。因為傷處未能保持清潔，微菌侵入，不久即起膿化作用，一直養了三個多月，方纔養好。

俗語說：「禍不單行」，這話好像是為父親說的。正在父親養傷的期間，營中接到裁併的命令，兩營合併為一

營，結果裁去了大批人員，父親不幸也在被裁之列。在貧病交加之中，忽又慘遭失業，這種突如其來的威脅，在我們無論如何都是預料不到的。

從此以後，家庭的費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來維持。家兄在騎兵隊上吃一份馬糧，每月關七兩二錢銀子，這前面說過的。我吃的是步兵糧，每月關三兩六錢。兩個人合起來，除了馬吃的，不過七兩二錢銀子，尚抵不上父親一個人的收入。以這樣微小的收入來養家，日常生活的窘苦，可以想見。過了不久，家兄又因事他去，家庭費用，更弄得不到維持了。

我永遠不能忘記的，是父親在這種艱苦的境界中，仍然親切的關懷着他的愛兒。直到今日，每當我獨坐沉思的時候，一想起父親當時對我的那種慈愛之情，不由我感痛得流淚。

那時我們軍隊中的規矩，是三八打響，逢五排十打靶。所謂三八，就是初三，十三，二十三；初八，十八，二十八。逢五排十，即初五，十五，二十五；初十，二十，三十。每次打靶的時候，我從家裏去的很早，（那時當兵，不一定都住在營中，上崗而外，其餘時間即使全在家裏待着，也沒人過問。）父親疼我年紀小，怕打靶的時間過長，每次總給我六個制錢，叫我買兩個燒餅揣在懷裏，預備餓了的時候好掏出來吃。從父親手裏把錢接過來，自己在路上一面走着，一面不住的打算。心裏想，父親的飲食已經淡薄的很了，我怎麼能再拿錢去買東西吃呢？而且父親拿這六個制錢的時候，那錢袋裏不是只剩下幾十個制錢了嗎？老人家的心情，該是怎樣的苦痛和焦急啊！我想了又想，怎麼樣也不忍

得把這六個制錢花掉，於是決計把它留起來。

打響，每人每次得領五十個藥條。這些藥條，並不一定都須打完，每人總要剩個十幾條，自己賣掉，換錢用。那時，有個教習閻吉勝收買藥條，每次打響完事，他那兒就站擁很多目兵，爭着換錢，彼此見了，只相視一笑，誰也管不着誰。這事已成了公開的秘密。我每次剩下的藥條，可以賣得十幾個制錢，加上早晨父親給我買燒餅吃的錢，一共大約可以湊個二十四五個制錢——保定府用的是津錢，叫做五十錢——我有了這些錢，就到肉舖裏買半斤豬肉，提着飛奔回家，預備燉好了，晚飯時候給父親吃。父親失業之後，葷食本已斷絕，這時居然有燉肉吃，自然覺得欣慰。可是這燉肉從那裏來的呢？父親禁不住要問了。

「從那裏來的豬肉？」父親剛拿起筷子，就向我發問。

「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……」我低着頭囁囁地回答。

父親看見我這樣的情形，越發非問不可了。最後問得無可奈何，我只好將原委說出。他聽了之後，立時把筷子放下，眼淚不住的望下流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現在我回想這種情形，猶歷歷在目。

父親對待我們孩子，總是親熱慈祥的，從來沒有嚴厲斥責的時候。小時候我老覺得父親比母親還要慈愛。母親有時因家事煩惱，常常對孩子發脾氣，以發洩她心內的苦悶，然而父親却永遠甯靜，永遠安祥溫和；他的慈愛的音容永遠在我們眼裏閃爍着。

時間一天一天過去，父親從失業以來，差不多半年了，百般設法謀事，總沒有絲毫的希望。生活時時感受到嚴重的威脅。後來他幾經考慮，覺得非南返故里不可。

南行計劃既然決定，唯一的難題就是川資。那時從天津到上海，輪船票價是十兩八錢銀子，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費，由上海到巢縣的一段路費，合計起來，至少須十八九兩銀子，方纔敷用。這麼一筆大款，向那裏弄去呢？父親從前固然是半點積蓄也沒有；親朋戚友都如自己一樣的窮困，借貸的事更是辦不到的。處此情況之下，左思右想，實在沒有辦法，不得已遂將自己住的房子轉典給當地一戶人家，得了十五兩銀子，不足之數又變賣了些動用物件，才算解決了當前的難題。

我們一家，只父親同我兩個人住在一起。父親是怎麼樣也不忍丟開我的；我呢，自然也不願離開父親。一個十八歲的孩子，隻身孤影，流落異鄉，在父親實在不能放心；但如果一同回南，原已籌好的川資又發生問題，這使得父親已有的決心也不免動搖起來。然而同留北方，事實上已不可能，當初萬一有些微的辦法，父親是決不作南行之計的。數月來的窘困生活，實在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。

因為房子已經典賣給人家，父親要動身走的前一晚，新房主一連來察看了好幾次；這顯得我們一家人已無棲留之所，一種淒苦的感覺圍繞着我們，使我們禁不住相對落淚。屋裏的一點木器傢具以及應用的什物，早幾天已變賣盡淨，這時所餘的，祇有父親炕上鋪着的幾件簡單的被褥，和正屋裏布幔中的一幅觀世音菩薩像。如此

情形，看來真叫做「家徒四壁」——但這四壁又何嘗是我們的呢？

這晚上，父親一邊流淚，一邊囑咐着我，滔滔不絕；我坐在炕沿上，低着頭，只知嗚咽的答諾着。

「張管帶，苗管帶，高誠義：這三位，你千萬不要忘記了他們對我家的好處，以後你要想法子報答。我是不行的了，你可千萬不要忘記。」

這些話，本來是父親平素說慣的，但今晚聽來，分外覺得悲楚。

張管帶爲我補兵的事，曾盡過不少的心力，雖然並沒有成功，然而人家的厚意，總是不能忘記的。苗管帶爲我補兵，不及通知我的父親，連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，他那一片關切的熱忱，委實使父親感激涕零，曾不止一次的背後對他致深切的謝意。高誠義是父親的一個老護兵，父親所以紀念他感謝他，是因爲有過這樣的一段舊事：父親當哨長的那年，奉命到唐官屯（在天津迤南，是津浦線上的一个重鎮）挖河，挖完河之後，又奉令修築永定河。大概由於疲勞過度，又受暑受涼，忽然患了瀉肚的病，瀉得很是厲害。這時我同母親留在保定，並沒有跟他同去。隨同父親在一起的，只有護兵高誠義。因爲病狀太厲害，通身無力，連大小便都須高誠義扶持。後來越病得厲害，他照料得越是細心，一點沒有厭煩的表示。這種誠摯的盛情，實在是很難得的，無怪父親提起來，就要念念不忘；並且一再囑咐我，叫我務必必要答謝他的厚意。

我坐在炕上，越聽越覺得悲痛，前思後想，怎麼樣也難以制止自己的眼淚。

閒常父親談話，總愛把他過去的經歷以及祖母所受的苦難，反覆地說給我們聽；這晚上，他自然也談了不少。他說他當了哨長之後，纔買得起四十錢（合現在一大枚）的豬肉，燉小白菜吃飯，這算是頂好的飯食了。他還常常說：

「現在有豬肉吃，已經升到天堂裏了。」

然而會幾何時，這個幻夢又復破滅。

夜深了，四壁幽黯，萬籟無聲，襯托得屋內的氛圍益發淒涼，我的眼淚就同開了閘的流水一樣，一直無法制止。第二天一早，父親起來收拾行李，我也醒了，一面披着衣裳，一面望着他，心裏說不出的萬千酸苦，如同刀絞一樣。我幫着他把行李收拾完了，立即動身。他在頭裏走，我在後頭背着行李，送他去上船。在路上，一邊走，一邊哭，一直到了上清河的岸邊。

上清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條河流，上船的地方，靠近劉爺廟的東邊；從家裏到這裏約有半個鐘頭的路程。人到了生離死別感情奔放的時候，一切習慣上的拘泥都要在無形中被衝破的。在到了河干的一霎那，父親同我從心的深處湧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，不由自主的相互抱頭痛哭；我甚至大聲嚎啕起來。我自己心裏一方面想着一回兒功夫，自己就要成爲孤苦無告的游子，獨自嘗受飄流異鄉舉目無親的辛味了；同時却也惦念着父親。他南返以後，職業問題怕依然沒有希望解決，生活依舊得不到保障。父親的心理是和我一樣的：南返後職業既很

渺茫，而竟忍痛把十餘年來從未相離的愛兒丟棄在北方，我知道這是最使他難過的。我們一直哭到頭暈眼花，日脚漸漸偏西，父親始忍痛上船開行。我在岸上痴痴的站着，直到望不見桅桿方才回去。

父親走了，剩下我一個人在保定練軍營中（先在右哨，後到中哨）。營中的生活同父親在這裏時一樣，一點變化也沒有，但我却對一切都感到厭倦，對一切都感到空虛，整日裏如在雲霧中飄浮着，心神恍惚不定。同伴們有時同我談半天話，我却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朵；有時獨自傻傻地坐着出神，連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麼。那時郵政剛剛設立，郵件多從鏢局輾轉傳遞，由保定府到巢縣，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。從冬望到春，春望到秋，終年都在失望之中。我千方百計的探聽走信的歷程，預計信函來到的時日，並且幻想我的信到達父親手中時的情景，但都不能排解我思親的哀愁，雖然我只有這樣，才覺着精神上有所慰藉。

在保定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掙幾兩銀子，好早日接父親回來團聚。我們軍隊中每哨裏都有一個喊口令的教習；設置這教習的用意，說來也十分可笑。原來當時軍隊中的軍官，什九都是仗着同鄉親戚的援引而來，其中受過軍事教育的固然也有，但大部分都不明軍事。別的事不必說，連喊操他們也不會。於是由於事實的需要，每哨裏要設一個教習，專門代替官長喊操。教習的待遇沒有一定，須看所能喊的人數之多寡，定其高低，有的能喊三五十人或百幾十人，有的能喊至千八百人不等，普通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。當時自己想不出較好的辦法來，心想當這樣的教習我也許有點把握，於是每天還未明即到東大教場學習喊操，放大了喉嚨，「立正，」

稍息，「托槍，」開步走，「大喊一陣，喊得喉嚨乾啞了，也總未間斷過。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，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，拜神上供，正在忙着享受他們新年的歡樂，我依然一出門就練喊操，引得人家都笑罵我。如此一直練了四年，我居然有了驚人的成績。後來各哨裏目兵都認識我，就是因為這個原故。

勤勞人的社會不許懶人立足，同樣，懶人的社會也不許勤勞人立足。因為每天天還沒亮，我就起來練習喊操，我的聲音洪大，操場離營房又近，營中好睡懶覺的目兵，就十分厭煩我，並且因此招致了他們的妬嫉和譏笑。後來他們送給我一個外號，叫做「外國點心，」意思是說我如此拼命，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，洋鬼子來了，必定先要用洋藥丸崩死我。對於這個綽號，我欣然領受。我說：「我一定要做欺壓我們的外國人的仇敵，我情願叫外國人崩死我。」

他們這樣的凌辱我，有幾位我的朋友就為我抱不平，要同他們爭吵，甚至動武。我聽見這事，就和朋友說：「好弟兄們，我正願意叫外國人打死我！因為我要保衛國家，抵抗強權，外國人一定要打死我的。外國人把我打死了，那倒成全了我。」我特意刻了一顆「外國點心」四個字的圖章，到現在我還保留着，有時給人家寫對聯，我還蓋用這顆圖章。

我這樣用功練習喊操，對於身體的裨益實非淺鮮，因為早上空氣新鮮，喊時渾身使勁，天天如此，從不間斷，吃仙丹怕也沒有這樣大的效益。除此之外，我也酷好各種武術，自小勤奮練習，興趣極濃。我現在也順便在此一述。比

如摔跤，打拳，舉石頭等，我都下過很大的工夫。摔跤，漢滿蒙人都愛練習。保定府以及四鄉各村，每到冬天的傍晚，自七八歲的小孩以至三四十歲的大人，都三個一羣五個一夥的聚集在郊原上，練習摔跤。怎樣用手，怎樣用腳，怎樣擺好適當的姿勢，都有精審的考究。胳膊，腿部，身子，也都要分別練習。練得好的，處處到功；練得不好的，一摔就倒，而且很容易摔壞了身體。練腿的方法，是在院子中打一個木椿，時時用腳去踢，漸踢漸使勁，踢得腿部腳部比鐵還硬，一踢，那木椿就「朋的」發出渾重的聲響。練胳膊是碰樹幹，碰木柱。不管在何時，在何地，看見樹幹或木柱就用胳膊使勁碰它幾下，日子一久，自有很好的成績。至於整個身體的練習，則在坎地中行之。這在保定府就叫「跑坎頭」。其法是由遠處跑上坎頭，而後將手落地，再從上面摔下來。要練得不傷筋骨，不傷五臟。練得好的，摔下來時全身縮成一團，成爲一個緊湊的疙瘩；不會的，則四肢張開，渾身鬆懈，很容易受傷。打拳，北方鄉民和軍隊中都普遍的愛好。我們的練軍雖然不注重練習，可是對於各種拳術却頗爲講究。軍中有雜技一科，刀槍劍戟無不分別傳授，我們一早一晚都熱心練習。此外還有舉石頭，其重量可分六十斤，八十斤，一百斤，一百二十斤……不等。我們每天都要練一次，各人按其體力，選擇適當重量的石頭，逐漸替進。我普通可舉一百四十斤的石頭。此道可擴大肺部，全身使勁，真是很好的運動；我現在仍舊常常的練習。

我至今身體強壯，精神健旺，回想起來，都是平素勤習苦練的結果。許多人以為我生來如此，其實世上那件事不是慢慢練出來的？下一分功夫，即有一分效果。功夫下的越深，則效果越大；不下功夫，即無效果。這是一點不錯的。

第五章 光緒二十六年

戊戌政變以後，清廷的統治愈益日暮途窮。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，義和團在山東直隸各處先後爆發蔓延。

由我這個親身經歷者所了解的說來，義和團起事的原因中，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衆與教堂間惡感的深化。外國教士初來中國傳教，我國人民對之極端仇視其原因，一是由於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，他們對外人本懷有歧視的觀念；另一方面教會本身也有許多不檢點之處，因而招致了人民嚴重的反感。那時教士們由於他們本國政治上經濟上地位的優越，在中國社會上形成一種特權階級；我國人民一旦受洗之後，藉着外人的勢力，便趾高氣揚，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任意生事。地方官因爲外人的牽掣，無法與以干涉，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。於是外國教士益發樂於在背後掩護，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，擴張教會的勢力。這樣一來，教徒的氣餒越高漲，人民對於教會的惡感越深，仇視的觀念一天天加強，一發遂不可收拾。當時在華教士，可分耶穌教和天主教兩種；耶穌教教士態度較天主教爲好。所以這兩種教堂，本質上雖同樣是人民眼中的公敵，但仔細分辨，尚有程度上的差異。

義和團原是白蓮教的殘餘，最初打的是反清復明的旗幟，在民間私相傳授。後來隨着教會與民衆對立之深

「刻化」於是便逐漸染有排外的色彩，由對內轉移而爲對外，形成一種中國初期反抗帝國主義的民衆武力。義和團初起時是在山東的曹州東昌一帶，他們的口號是「扶清滅洋」四個字。在這樣的號召之下，各地民衆風起雲湧的附和參加，到處焚燒教堂，仇殺外人，毀電線，拆鐵路。這種極端排外主義的表現，可以充分地說明民衆對於帝國主義的惡感，是怎樣的深刻和嚴重。

在義和團勢力最盛的時候，有所謂剷除二毛子的一種附帶運動。二毛子就是指中國教徒而言。平常因爲教徒們藉着洋大人的勢力對同胞作種種的侮辱，這時便不期而然的有一般人聯合起來，挨家搜查這種狐假虎威的二毛子。搜查時並沒有一定的標準，任使人隨意亂指，你家裏如有一個十字，就說你是個二毛子；他家裏有洋燈洋油洋火，也說是二毛子。一經指認出來，就百般的勒索。窮苦人家多少出幾個錢便可了事；富者則千方百計的與以刁難，非至傾家蕩產不肯罷休。這爲義和團本身，造成最嚴重、最可惋惜的罪惡。

練軍接到鎮壓義和團的命令。是在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。我們的隊伍最初開到保定府東北白溝河；在這裏稍事彈壓，百姓們便悄聲匿跡，完全平息。帶隊的張協統——山東濟甯州人——當天晚上和隊伍講話，出人意外的講出了這樣一段話：

「我們不要得罪百姓，義和團是好事。他們打洋鬼子，我們不要干涉。我們到這裏來，是上頭的命令，沒法子，不得不來罷了。——這是祕密的話，大家可不要告訴別人說。」

張協統這樣一講，軍隊知道了，百姓也就立刻知道。於是他們重新又把義和團練起來，聲勢反而較前更大了。因爲以前還是祕密的組織，現在則官憲方面已經默許了。依照當時的情況看來，如果帶兵的官長能夠認真的鎮壓，切實勸導，義和團的平復，倒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。不過當時官長都存有陽奉陰違的心，不情願真正消滅他們，但也無力指導他們走上正道，所以結果軍隊在東邊鎮壓，百姓跑到西邊去練；軍隊在西邊鎮壓，百姓又跑到東邊去練，形成一種故意放縱，掩人耳目的情勢。

義和團初起時的蓬蓬勃勃的盛勢，清廷委實吃驚不小。他們的運動顯然含着排外與反清的兩種成分，隨着時間的進展，客觀形勢的演變，排外的念頭也很可能的重復轉移而爲對內的鬥爭。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猶疑：勦滅他呢？抑或應當因勢利導，使它成爲純粹的排外運動呢？最後的決定是採取了後者的策略，立時由政府創練義和團。從此這一幼稚的民衆運動，便被清廷所利用。

三月中旬，保定府接到創練義和團的諭旨，各地遂公開成立團練，彰明較著的從事練習。保定府城南五十里，東流大寨口內有個天主堂，這時候遂成了衆矢之的，義和團爲要做些實際的工作給民衆看，便率大隊兵丁去打這座東流天主堂。爲此問題，練軍的官長分裂成爲兩派：一部分官長主張打，一部分官長主張不打。主張打的一方面認爲既然奉令練習義和團，自當先殺些外國人，以正觀聽而平民氣；主張不打的人，則顧慮到怕因此釀成禍變。後來主張打的人佔了決定的勢力，當晚即調動隊伍隨同義和團一同出發。

練軍已經久未經過戰事，一切行動和計劃都幼稚得可笑。出發的時候是在晚上，每人給一個紙糊的燈籠照路，幾百的燈籠聯在一起，排成二三里長的行列，從遠處望來，火光燭天，好像正月裏賽龍燈似的。那時我就懷疑：晚上行軍，怎麼可以打燈籠呢？自己疑雲滿腹，莫測玄奧。在路上走着，倒覺得很好玩，一點也不感到寂寞。離東流約有二里左右，正在進行的當兒，天主堂那裏砰砰地響了兩槍，衝着行列打過來；義和團在前頭，聽見槍響，回頭就跑，隊伍也隨着潰了下來。鬼也沒有看見一個，就一退二十里。那時也不懂什麼叫做兵站，吃的東西都是臨時由百姓供給，聽說隊伍退下來了，百姓送來的烙餅，就命名爲「得勝餅」；送來的綠豆湯，命名爲「得勝湯」；送來的茶，也叫「得勝茶」；什麼都是得勝，那心理真是可笑。待了三四天，又決定繼續進攻。這次進攻，由兩個人抬一副門板，走在前面，藉以掩護後頭的隊伍，不料剛剛要衝上去，天主堂那裏劈里拍拉又是一排槍聲，把這邊打傷了好幾十，死的也有好幾位。隊伍敗下來了，你抱怨我，我抱怨你，大家對於義和團的信仰，不由得起了動搖。正在這時候，隊伍即接到上諭：嚴拿義和團匪兵。於是轟動一時的氣勢蓬勃的義和團，遂急轉直下，走向敗亡的結局中。

原來這時八國聯軍已經攻陷天津，聶士成力戰陣亡，敗報傳到京師，西太后等倉皇出走，在北京留守的，只剩了慶親王奕劻等數人。拿辦義和團的上諭，似乎就是這時傳下來的。我們的隊伍接到這道諭令，就到處攻打義和團。始而下令提倡，繼而又復下令捕拿，朝令夕改，軍民不免怨言四出。關於滿漢的界限，這時也有許多目兵已有一點模糊籠統的概念，也有些目兵連這一點概念也沒有，官長都是拿錢吃飯主義者，叫打就打，不打也行，自己反正

是沒有主張的。

不久，北京亦爲聯軍所陷，京津一帶的潰兵大批的直向保定府退下來。這些軍隊，平素沒有主義，沒有訓練，到了這時，有限的一點紀律，亦全部廢弛，沿途任意搶掠，百姓所遭的劫難，真是不堪設想。其中有一幕駭人聽聞的慘劇，很值得一寫。那是武衛右軍的兵在潰退的途中遇見一位坐轎車的華貴少婦，手上戴有兩副赤金鐲子，因此觸動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。他們尾隨着她，到了晚上約在六點左右，有十幾個士兵蜂擁而上，喝令轎車站住，強迫那女子把鐲子交出，那女子堅執不肯，士兵大怒，抽出刀來，照着女子的肩膊砍下去，連同手臂一齊砍了下來，鐲子遂被士兵搶走。

所謂赤金鐲子，那時隊伍裏弟兄們聽說過的人多，見過的人可少，兩副鐲子爲少數人得去，其餘的人不免眼紅，這時看見得鐲子的人走在前頭，後面的人便開一排槍，把前面得鐲子的人掃數打死，鐲子不消說就歸後面的人所有。消息一傳到最前頭的一連人的耳朵裏，他們也眼紅起來，立地將隊伍散伏在兩旁的高粱地裏，等候得鐲子的人來到，又是一排槍，將那班人全數打死，鐲子遂又由他們奪走，分途四散。合計起來，爲了兩副赤金手鐲，害死一個女子，又害死整整一連官兵。

潰兵從京津一帶退走的時候，練軍即在保定附近設放幾十道卡子，專門收繳潰兵的槍械。鐲子的慘案發生了，又臨時奉令盤查帶赤金鐲子的潰兵，查出來，就立地槍決。當時查出的嫌疑犯約有四十多個，統統都就地槍決

了。這一事件，連同各地槍殺的嫌疑犯，至少怕也在千餘人以上。軍隊平素沒有訓練，沒有紀律，是多麼危險的事，這是我們應該知所警惕的。

保定府焚燒教堂的情形，說起來也非常可笑。每次動手，百姓們聚集教堂附近，先大聲呼嘯一場，呼嘯完了，然後再縱火焚燒。隊伍接到百姓縱火的報告，即出動鎮壓，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，即停止不前，等到教堂燒完了，再疾趨而進，敷衍塞責。保定府東關和南關的教堂，統統是如此燒掉的。因為這個原故，聯軍於攻陷京津後，即派兵進佔保定府。聯軍未到以前，官府下令，二十里以內不準住百姓，以便外國兵駐紮。命令一下，百姓扶老攜幼，紛紛出逃，有資財的人有地方可逃，倒還沒有什麼大關係；窮人呢，就哭天號地，走頭無路了。

聯軍開到前三日，保定練軍已陸續退出，後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張紹緒和我。他同我到藩台衙門去，請示留守處刀槍鐵矛以及給養等如何處置。到了那裏，張副哨官向中軍官說述來意，那人微笑了一下，直截了當的回答說：『這時候護院大人自己還顧不了自己，那裏能管這些閒事！請您緊趕回去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。』

若是在機警一點的人，一聽這話，自然應該立刻回來，趕緊自己設法處置了，預備出走。那曉得這位張副哨官却堅執地不走，非要請示護院大人不可。中軍官不耐煩，就一直支吾他。他們說話，我在外頭聽的很清楚，心裏實在悶不住了，就一步進到屋裏說：『中軍大人，張老爺，我們不可把東西都放到井裏糊起來，上面再用東西掩蔽，咱們該怎麼走就怎麼走。』

中軍官一聽我的話，連聲說：

『好好，好！就這麼辦，就這麼辦。』

這樣我們纔退出來。一路上張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，說我多嘴，不知高低，好管閒事；我也不便和他爭較。剛走到營門口，正要進去的時候，有個人飛奔的從東邊跑來，說外國兵來了。大家一聽這話，也就顧不得入營，急忙向西逃竄，留守處的東西不消說全都丟了。這次我算深深領教了那些官長，他們都不過是些酒囊飯袋；事先如果稍有打算，留守處的東西我想怎麼也不會丟掉的。

使我最驚訝最痛心的，是我在西城所看見的情形，這時城裏的許多大人先生們，居然已經預先製好了八國的國旗，看見小個兒的鬼子進來，就把太陽旗高高的懸掛起來，表示是大日本的順民；看見高個兒的鬼子進來，於是又換上德國旗，表示是大德國的順民。懸掛外國旗的，一百家中起碼總有六十家以上；而且每家都置備八面，相機輪流懸掛。然而穿短衣服的勞苦同胞，却不作這種勾當。這也許他們有硬骨頭，不肯這麼做；也許是因為他們窮，根本沒錢買置八塊布的緣故。這種奴顏婢膝的劣根性，真正叫人氣死！如此民族，被人家生吞活剝，隨便凌辱，原是不足為怪的。我覺得這都是我國數千年來封建文化和奴隸教育的結果。

聯軍進了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藩台廷雍，騎兵營營長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殺掉了。因為保定府義和團初起時，藩台廷雍在背後主張得最力。那時保定府城守尉——清廷的親貴——會暗中積極慫恿廷雍鼓動拳民，擴大

排外運動；廷雍受此激勵，益發瘋狂的獎勵義和團的暴動，北關南關兩處教堂之被焚，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。教堂正燒的時候，王占魁又乘機將南關教堂傳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來槍殺了。因此聯軍動了公憤，一進城首先就把他們三人抓住，在莫姑娘被殺的地方，一一殺掉；同時還用地雷把城角轟坍了一大塊，留下了一個永難磨滅的民族恥辱的紀念。聯軍統帥瓦德西，這時也駐節保定府城裏。

我跑出城來，就到城東中陽村趙萬順先生家裏暫避。趙萬順是我幼年時的一個朋友，他家裏有他的老太太，女人，小孩，同他的一個兄弟。在這裏住着，我得到幾個極深的印象，至今猶不磨滅。趙家吃飯，每餐只喝兩碗小米稀粥，一天兩餐，都是如此；粥裏只有少許的米粒，簡直不能充飢。我家裏雖然窮，可是一天只喝兩餐稀粥的生活却還沒有見過。後來我問趙老太太：

「你們光喝稀粥嗎？」

「天氣快冷了，」趙老太太說：「每天沒有什麼事做，用不着吃得大飽，喝兩碗稀粥就算很好，比咱們家強的也是這樣。」

經我這次叩問以後，趙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，每餐特意留幾塊紅薯給我吃。老百姓原來每天只喝兩碗稀粥呀！在這兒，我不由得想起了鎮壓義和團時所見的一幕情景：我們的隊伍開到容城，住在北關一座文廟裏，時在初春，天氣極冷，白溝河縣官爲要博得軍隊的歡心，特爲我們預備了一堆同三間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，放在廟裏給

我們作烤火之用。火簇熊熊的燃燒着，我蹲在大殿裏，心裏不住的在想：「這筆錢從那裏來的？不是從百姓身上抽出來的血汗嗎？」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括的時候，鑷鉢必較；搜括到手，却這樣揮霍如糞土，這樣的糜費無度！這一幕奢侈浪費的情景，與眼前自己所親見身受的艱苦情形比較，叫人作何感想。

聯軍開到保定，並沒有攜帶糧秣，於是每天一早到四鄉各處去劫糧，並且抓人抬東西。百姓一看這情形覺得不妙，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飯，吃完早飯就逃向村外，找個低凹的地方躲着，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。那時我們往往躺在窪地裏，臉向着太陽，心裏說不出的悲憤，說不出的痛楚；肚子裏一面在鞭鞭作響，奏成一曲飢餓與憤激的交響樂。

一天，我們從地裏回來的很早，正吃晚飯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陣打門聲，嚇得大家立刻丟下碗筷，急急惶惶地向菜窖裏躲。後來仔細傾聽，才聽見外面不住的喊：

「趙大哥！趙大哥！」

趙萬順就同我說：

「你的個兒大，你隔着牆望一望是誰？」

我隔着牆頭向外一望，看見門口站着一個二十餘歲的男子，後面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。經了一番詢問，我把門開了，原來那女子是趙萬順兄弟的未婚妻，因為荒亂，家裏不敢負責，特意領交趙家來完婚，了却一樁心事；

那個男子，不消說就是那女子的哥哥了。爲了居住方便，家裏立刻爲他們結婚，當時就在地上掃了一堆土，插了三根草棍，參拜天地，完成婚禮。正在這時，又聽見外面有人嚷：「外國兵進村來啦！」萬順的兄弟一聽這話，也顧不得害羞了，抓住他新婚妻子的手，急忙的跳牆跑了。萬順，萬順的老太太，萬順嫂子，都抿着嘴對他倆嗤嗤地笑。

外國兵抓人抬東西，年輕的小夥子是不要的，專門要抓五六十歲的老頭兒。因爲老頭兒身體弱，抬東西時常常摔倒；這時外國兵就在一旁鼓掌大笑，引以爲樂。這時要是老頭兒的兒子看不過，要上前代替老頭兒去抬，外國兵就拳足交加，沒頭沒腦的一陣亂打。最殘暴的要算是日本兵，許多慘無人道的事情，都由他們做出來。他們常常拿百姓當靶子，隨意瞄射，比如他們在站崗的時候，若是望見百姓遠遠的步行而來，便舉槍瞄準，打中了的時候，就拍手狂笑不已。那時村上老百姓們在一起談話，都以此爲中心，不是說東村裏打傷了人，就是說西村裏打死了人。姦淫的事情，更是層出不窮，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歲以下的女人，被外兵姦淫至死的不下二三百起。

在趙家住了不久，打聽到我們的隊伍在固安縣大宮村駐紮，我就到那裏去；路上整整走了兩天，每天足要走一百多里路。兩天的長途跋涉，走得我精疲力盡，渾身痠軟得如同麻木了一樣。平素我的身體本很強健，只因這次住在趙家，每天只喝兩餐稀粥，營養太不充分。又加我在路上走得太急，所以到了大宮村，身體感到極度的疲弱，幸虧隊伍找着了，並沒有什麼意外的不幸遭遇，我得有安心的休息。這時在大宮村同住的隊伍，尙有天津鎮錦字六營，是由徐錦標帶領的。

隊伍在這裏住着，李鴻章已由廣東趕到北京議和。這時聯軍堅持要清廷交出四兒，然後才能停戰撤兵。所謂四兒，就是戴漪、戴勛、董福祥，和剛毅四個主動奉變的人。這條條件確實給清廷一個大難題：因為四兒裏頭，親貴佔了三個；還有一個，也是朝廷的重臣。這如何能夠輕言交出？後來聯軍以清廷不允所求，揚言要繼續西進，駭得那位與唐朝武則天先後媲美的西太后，急忙由大同跑向陝西；同時即匆匆諭令戴勛革職，剛毅交督察院吏部議處。不料正在這交涉停戰的時候，忽然大宮村又出了槍殺德兵的亂子；剛剛有一點眉目的調停交涉，至是又生出枝節。

那亂子是這樣發生的：大宮村錦字六營的一個士兵在村外放哨，瞥見從涿州那邊來了兩個德國兵，騎着馬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。那兵激於一時的義憤，舉起槍來打落了一個，另外一個回馬即逃。死了的落了馬，放哨的那兵就將馬牽走，以為出了一口氣，心裏萬分痛快。這件事，除開那放哨的士兵外，村裏的隊伍不消說大家都不知道。不久，德兵大隊到來，在二、三里外即開槍攻擊；隊伍聽見槍聲，一時摸不着頭腦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只有向後撤退。錦字六營退向滄州，保定練軍退往蠡縣。因為時間匆促，應用的東西都不及攜帶，沿路受盡辛苦。到了蠡縣，我們的隊伍住在城東侯家佐，其餘分駐於城內外各處。

大亂以後，一切政務都陷於停頓狀態，軍隊這時同沒了娘的孩子一樣，零仃飄泊，給養無着，吃的雖暫由地方上供給，可是餉用却成了問題，即便極少數的買菜的錢都付不出來。吃的小米又壞，每次吃飯，只好圍圍着向肚子裏吞嚥。義和團事件後來雖然結束了，然而他們所留下的苦難的日子，却得要大家慢慢地熬着。

第六章 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

轉眼就是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過新年的時候，營中的同伴們因為心緒苦悶，生活無聊，又嚷着要賭博；有幾位又勸又拉，非要我加入不可。這時我已積有六七吊制錢，老朋友趙萬順也儲有四五吊，都存在我的舖後頭。經大家一番勸誘，一瞬間的轉念，由於我那時年紀輕，竟又把持不住。賭博場設在本地大紳士趙東海家裏。頭一局大家公推我做莊，因為沒有寶盒，臨時用竹子牌代替。頭一寶拖出來，趙東海就問我：

『你向來不說瞎話，我問你，這一寶是幾？』

我回答說：『是三！』一句話剛說完，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把注子下在三上；等到把寶開出來，果不其然是三。這一寶，整整把我的莊底都挖空了。後來大家過意不去，商量不要我賠錢。我說：『那不行，既然輸了，我自然應當要賠。你們不要不成！』

大家散了之後，我找了一把刀，對準左手，忿恨地說道：

『以後你再不改，還要繼續賭博，非把你砍掉不可！』

到了正月初六，練軍始正式接到改編淮軍的命令，歸李鴻章節制。至是，我們的隊伍才算有了着落。改編的結

果，計共編成騎兵五營，步兵五營；我編入元字前營，統由呂本元帶領。當時所以改編為淮軍，說起來也頗饒興味。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，第一步即着手整理境內散住各處的潰兵，惟因大亂以後，財政異常困難，餉項無從籌措，不得不商請淮鹽商代墊；淮商應允了，但堅持須以改稱淮軍為交換條件，所以隊伍一接到命令，即點名改編，換成淮軍的新名號。

隊伍經過改編，老弱全都淘汰，被裁的官兵每人發四個月餉。餉銀係一種「松江銀錠子」，黑而且雜，成色極劣。這次我領下來的餉，差不多全數都付了在趙先生家輸的眼，因為一些老朋友都被裁回家，沒法子不還賬。朋友們都走了，我們這一棚人，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一時不免十分感傷；同時我又重復拿起刀，對着左手，仍如前次一樣恨恨地罵了自己一遍。

改編以後，隊伍仍舊駐盩縣操練。我們的營長是李洙熙，幫帶是傅應金，哨官是何樹堂。名義雖然改編了，軍中的一切情況，仍然如從前一樣，散漫泄沓，種種惡習，一點也沒有革除。官長們，學識能力很好的固然也有，但大多數都是靠着眷戚鄉親的援引，才升任上來的，他們既無學識，亦無經驗，根本不知練兵為何物，所知道的，只是「作官三輩爺」（自己是老爺，上輩是老太爺，下輩是少爺）的大道理。結果弄得死氣沉沉，糟成一團。因為改編的緣故，餉章也更改了：每三十三天，方才發餉一次，每人三兩三錢松江銀錠子。這時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諺語，是：「三十三天三兩三，既扣吃來又扣穿。」甚至連弟兄們結辦用的繩子，也被剋扣了去，弄到月底，往往一錢不剩。好像那時當

官長的唯一工作就是剋扣士兵的血汗錢。

正月下旬，蠡縣邊境來了大股土匪。匪首車輪標，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，因為犯案發作，急而生變，遂嘯聚流氓，結成極強悍的股匪，四出劫掠。隊伍從正月月底奉令追剿，一直剿到六月間，始終沒有把他剿伏。軍隊平素訓練的成績，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。其中柏管帶所統的右營，不僅隊伍被匪擊潰，連餉車及「洋抬桿」（當時的一種兵器，每營二十桿，）也被土匪截去。這真是國家練兵以來空前的軼聞！原來柏管帶向來喜住民房。這次也是住的民房，出發的頭一晚上，護兵傳差事，絲毫不知機密，高聲嚷嚷道：「明天幾點鐘出發，某哨在前頭，某哨在後頭，餉車在中間。」這麼一嚷，土匪的偵探先知道了，於是預先伏在高梁地內，等候餉車一到，一陣黑槍把軍隊擊散，餉車等即被搶去，士兵也傷亡很多。餉車被截，全軍爲之震動，上峯嚴令追擊，務要迅速剿平。

土匪掠得餉車後，即竄往山中暫避。隊伍聽說，接着也向山裏頭追去；我們右後兩哨在一路，前左兩哨在另一路，前左兩哨走的是小路，兩岸皆山，形勢奇險。剛過望都西北的山中，就和土匪碰頭，倉促間被土匪一排槍，前頭的騎兵回馬便跑，因為來勢兇猛，後頭的步兵躲閃不及，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數。這一來，士兵幾乎嚇破了胆子，有幾個潰散下來，跑到民間，慌忙把軍衣脫下，將頭髮散開，就向竊缸裏頭亂鑽。等到我們隨後趕到，找了半天，才把他們從竊缸裏頭一一拖出來。那時官長貪錢不做事，當兵的沒有訓練，只知貪生怕死，胆小如鼠，說來真是異常好笑的。

隊伍稍加整頓，繼續進剿。那時正值下雨，一路上走的都是山。原來預定的路線是由易州，涞水等處前進。出發

後走了幾天，有一天上午迎面來了一個狀似農夫的漢子，向幫帶報告：

『車輪標正在前頭一家莊院裏，特來報告。』

幫帶聽見這話，立時令隊伍迅速前進，準備攻擊。走了沒好遠，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莊院，樹木密茂，隱約地可以看出鱗次櫛比的瓦房。這時隊伍就不問青紅皂白，散開了，對着那莊院開槍射擊。打了半天，裏頭一點動靜也沒有。許久，才走出來一個老頭兒，大聲喊問：

『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』

隊伍說：『我們來打土匪的。』

『我們這裏那有土匪呀！』

士兵不由分說，攆擁着向莊子裏跑去，搜得了細軟，就隨手望腰裏掖；看見成缸的蜂蜜和臘肉，好像八百年沒吃飽的一樣，一碗一碗盛了望外端，一邊走着，一邊用舌頭舐吃。後來索性連廚櫃也給撬開來，貴重的衣服擄取一空，弄的全院子裏亂七八糟，零亂不堪。

土匪沒打着，倒把人家的莊子搶了；事後人家怎麼也不肯干休。原來這是肅親王的一所莊院（聽說現在肅親王已住到日本去了），那時一共有十幾頃地。莊主着人追究此事，幫帶說，路上遇到一個狀似農民的人來報告，說車輪標正在莊子裏，所以才來打的；並說那人穿的什麼衣服，什麼樣子。這才知道那人是幾天前莊子裏被革去

的一個長工，特意挾嫌捏報的。但莊主終不肯就此罷休，說無論如何，軍隊也不應該藉端劫掠。幫帶無可奈何，允許賠償損失，途中並將那說報的長工抓獲，槍決了事。以後聽說慈禧太后回鑾，肅親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裏，太后也答應賠償，此案始行了結。帶兵的人聽着什麼就信什麼，率爾從事，漫無紀律，鬧出這樣的亂子，真是太荒唐了。

從這裏隊伍即不再前行，重復回到望都。這時我聽到一個最痛心的消息，那就是這次訂立的辛丑條約中有拆除大沽口砲台的一項規定。這個消息在旁人聽了，或者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觸，然而在我，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樣的肝胆欲碎。當初修建這大沽口砲台，我是親身參加的。那時我還抬不動土，白天幫着大家掃土，晚上隨父親出去巡營。同營的弟兄們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裏工作，經過長久時期，容易修建成功，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！如今忽然宣佈拆毀，而且叫中國人自己拆毀，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？

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血淚締結成辛丑條約，雖然眼前瓜分之禍暫時倖免，然而巨額的賠款，却種下了中國人民日後永難逃脫的經濟厄運。關稅鹽稅都作爲賠款的抵押品，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的在人民身上榨取，以支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。條約締結以前，李鴻章即已病故。他從廣東回北京時，路上曾暈了幾次船，到了北京，在強敵壓境的情勢之下，締結這樣的城下之盟，經過長時期的折衝，交涉處處掣肘，因此外感內傷，一位晚清最負盛名的外交家，就輕輕殞謝了。李鴻章一死，算是感動了洋大人的心腸，才允許簽訂他生前所擬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讓步的和約草稿。這就是後來的辛丑條約。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的便是袁世凱。

和約既成，慈禧太后方從西安動身回北京。回駕的路程是由西安繞道河南，由河南起早到保定；十一月二十一日駕到保定。這顯然是慈禧要避讓聯軍的鋒芒的緣故。因為當她起身時，條約剛剛締結，京津一帶的聯軍還沒有完全撤退。可憐這位西后，由北京逃到宣化，由宣化逃到大同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；由西安又繞道河南回京；這沿途風塵之苦，也儘夠她消受的了。可是聽說她這次從河南到保定，沿途上縣官因辦差不力，被太監王公們打跑了的，很不在少數。官府尚且如此倒臺，我們老百姓所遭的災殃更可想見了。

慈禧還沒有到，保定府已忙得不可開交。我們保定練軍奉派担任「卡輪」的工作。所謂「卡輪」就是護衛的意思。挑選的都是大個子，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。我們身上都穿着藍布開叉袍，手裏拿着紅漆柳條小播羅，潑街，黃土墊路。慈禧的行宮就設在總督衙門內。我在衙門口「卡輪」，向裏面一張看，只見燈籠，火把，旗羅，寶扇，斧鉞，紅毡等等，輝煌奪目，擺成行列，極盡富麗堂皇的能事。國家快要亡了，仍然這樣窮奢極華，作成作福，百姓怎麼不遭殃呢？我一面洒水潑街，一面心裏這樣的想着。

兩宮到站的時候，我正在車站站崗，因此得瞻仰到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。太后下車來，身上穿着青花綵的大坎肩，頭上梳着滿裝「兩把頭」，腳上穿着一雙三寸高的木底鞋，走起路來安詳緩慢，十分驕貴。看她樣子已有六十多，滿臉皺紋，臉上沒有抹紅，可是塗着一層很厚的宮粉。當她進站後袁世凱叩見的時候，我聽見她說：

「我們娘們不要緊了，到了家了，什麼事也沒了。」

兩宮在保定沒有久留，即轉車回北京。

我們的隊伍由望都回來，共計一營四哨，住在保定府西大寺，後來又移住西邊的豐備倉。這時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習。小教習又名副教習，因為軍隊中會喊操的長官不多，每哨裏都設有喊操的正副教習。教習還有一個名號，叫做「靠把」，恐怕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。那時喊操的教習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天，管帶李洙熙正在營部裏坐着，何哨官去見他和他說道：「請管帶給馮教習加三錢銀子。」聲音很是卑謙。李管帶一聽，回答說：「這辦不到。」乾脆的回絕了。這時我正在隔壁房間裏，所以他們的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。當時管帶的薪俸，每月連同吃空名字在內，可以有四百兩銀子；當哨官的至多也不過四十兩銀子，如今這位哨官要求加給三錢銀子，竟碰了這樣一個釘子，可見此時的將官是怎樣的視財如命了！

營裏的伙食，是每天發給小米。我向來是不慣吃米的，而且那種小米沙子極多，怎麼也吃不下去。勉強吃到肚子裏，一天到晚咕嚕作響，一點也不能消化。不得已只有自己買兩個燒餅充飢，可是每天只能吃兩個，多了便沒錢。於是整天餓得肚子發慌，實在餓得沒辦法，便弄點水把小米向嘴裏吞，雖然勉強嚥了下去，但終是很難過的。

我這時心身俱感壓迫，可是努力上進的心却益發來得強烈。這時我開始讀武衛左軍編的操法陣法，以及新建陸軍七項等書，得暇即讀，有時徹夜不睡，偷偷的點着燈誦讀。初時十句不過懂得三句，其餘都茫然不解，於是各處找人求教。如此長時期的努力苦讀，精神漸感虧疲，首先表現出來的是面色萎黃，食量低減。同棚子裏一位尙得

勝是好朋友，這時就規勸我說：

「看你一天瘦似一天。這樣的下去，一定要生病的。你應該保重你的身體要緊。」

我說：「尙二哥，你的好意我謝謝。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：第一，我就是唸書唸死了也好，免得變成一個庸碌無知的廢物，消耗世界上的食糧，一點事也不能做；第二，假使有一天我真唸好了，有了真知識真學問，出人頭地，那時能夠從南方接我的父親出來同住，那就好了。」

此後尙得勝再也不勸我了。正在這時候，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極大的興奮和安慰。正月底，直隸定縣王瑚鐵珊先生到了豐備倉。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，德性清廉，持正不阿，而節儉刻苦方面尤爲當時士大夫中所僅見。他在我心目中真是聞名已久，渴欲一見的一位高人。恰好他同我們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，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紹，得同他見面談話的榮幸。這次王先生給我寫了一個片章，使我喜歡得說不出口來。我把這個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後十分珍重的保存着，隔幾天拿出來把玩一次，惟恐把它遺失了。

淮軍的暮氣一天加深一天，精神紀律，都散漫廢弛，不堪聞問，我們的前途希望，至可焦慮。因此我漸漸生出異志。正在我躊躇徘徊的時候，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補上了武衛右軍第三營左哨的新兵。於是我也決心離開淮軍，要投入武衛右軍去。

武衛右軍是規定初二十五驗兵。一天，我換上便衣，前去應募受驗。走到那裏，正好驗上。回來我就同何哨官告

假我說：

『我要到北京去，那兒有個朋友叫我。』這怕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謊話。

何哨官是老交情，他的父親同我的父親是很好的同事，他就和我說：

『你如果有好投向，不妨去。不過在這裏，咱們住在一起，彼此有個照應，能不離開還是不離開的好。』

我堅執要去，他說：

『那也好，你明天再走，我請你吃頓飯，同你送送行。』

我謝絕了他的好意，回到棚子裏就收拾行李。同棚弟兄們都七嘴八舌的問我到那裏去。我說：『上北京去。』大家聽說，就託我捎東西，有的捎帽子，有的捎辮繩。我說：『你們把要捎的東西開下來，我回來再拿錢。』到了晚上，我自己抗着行李，順着城根望西門走，由西門繞到砲台附近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館裏歇腳，坐談一回，當晚就進入西箭道裏去，營盤就在那裏。從此我正式充當了袁世凱衛隊上左隊左哨六棚正兵。——這是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。

我們新兵每半月換一次班，上半月住在城東營盤裏，下半月住在城裏總督衙門裏。伙食自理，每月每人關四兩八錢銀子的餉。這時吃的糧食是小米綠豆，沒有砂子，可口的多了。有一次我們買了綠豆拾回營裏去，因為斤兩太重——足有一百七八十斤——路途又遠，一下子把我右肩壓了個大疙瘩，比鴨蛋還大，多天沒有好過來。我雖

然時常練習大刀，拳術，翻槓子，耍石頭等等運動，可是擡抬重東西，却還是第一次。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苦事，非經過一番練習決不能勝任的。以後我在車站上，或輪船碼頭上，看見擡抬東西的脚伕，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。

武衛右軍在「練」的方面實在比淮軍好，但在「訓」的方面，却不大講究。軍官中不識字的佔多數，不會喊操的却很少見。合計三十個軍官裏面，挑不出一個不會喊操的，這一點就比淮軍軍官高明多了。軍中很注意射擊打靶的教法雖不見佳，但能夠注意實習，即已不錯。我們直接的統領姓徐，領官姓張，哨官姓李。

八月中旬，袁世凱將總督衙門移到天津，隊伍也隨着同去。計共去右翼第二營，第三營的左右兩隊，陸砲山砲兩隊，騎兵一隊。隊伍開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，外人即出頭干涉，不許開進，理由是辛丑條約內曾規定天津二十里以內不准中國駐兵。經此阻頓，前頭部隊即行折回。我們到了楊柳青也奉令向獨流鎮撤退。辛丑條約中有不准中國在天津駐兵的條文，百姓不用說固然不知道，就是袁世凱怕也不見得清楚，不然，這次也不會冒冒失失地調令軍隊望這裏開了。後來右翼第二營換上警察的服裝，仍攜帶原來的槍械，才准開入。這是庚子之役後，我所親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與激刺。

我們的隊伍駐紮獨流鎮。這裏兩面臨河，前面是一條橫貫南北的運河，後面緊臨直達天津的小清河；兩河相隔六七里，獨流鎮即在運河之北。隊伍退到這裏，我們一部分暫時住在一家關閉了的當舖裏，其餘則分駐鎮內其他各處。我們開來的時候，行李都由後河乘船裝運，等船靠了岸，大家急忙去搬運行李。那時正碰着下雨，越下越大，

因爲急於要拾完行李，都打的特別大，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。獨流鎮土質非常的粘，一下雨就滿街爛泥。此時行李又重，地下又滑，走幾步就滑倒，滑倒了爬起來再拾，拾幾步又再跌倒。我一直拾到當舖裏，足足摔了十幾跤，弄得滿身爛泥，壓得我直裂嘴。

有一天出操回來，走過街上，一家門口站着兩個穿靴子的女子，年歲都在二十三、四上下。隊伍來了，她們倆也不預先讓開；等到隊伍到了她們門前，站在門左邊的一個女子可倒地，把靴子弄掉在地上，一時慌張，就急得光着兩隻小腳望門裏跑，那狼狽的神情，真令人忍不住笑。當時我就笑得對那女子的後身指了一下。這一指剛剛湊巧，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鏡走在我頭裏，我指的時候，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鏡上閃映了一下。回到營裏，哨官就問二行排頭閻寶發：

「你爲什麼指人家的女人？」

「我沒有指。」

「一定是你指的。前行排頭馮某人老實，決不這樣的輕舉妄動。」

閻寶發還是說沒有指，哨官就一定說是他指來。弄到後來，看看哨官要發脾氣了，我趕忙說：

「報告哨官，不是他，是我。」

哨官聽我這樣一說，嗤的一聲笑了，說：

『是我弄錯了，散了吧。』

哨官這樣的寬容我，真是使我慚愧極了。

我們在當舖住，有一個時候每天都要丟失東西。今天你失了小褂，明天他又失去包頭布，一天到晚嚷着丟東西。六棚人，共計八十多個弟兄住在一間大房裏，你猜疑我，我猜疑你，互相在背地裏嘀咕。我們六棚中有兩個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，一個綽號叫做牛毛，一個叫王火燒，他倆有時看見人家擲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來吸。失竊的事情發生了，於是大家疑神疑鬼，都說就是他倆幹的，常常對他們兩個人指桑罵槐，冷嘲熱諷。一天，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襖，他就向正目去要。王某原是李鴻章的肅毅衛隊來的，李鴻章死後，衛隊解散，每哨裏撥派幾名，王某即被派到我們這一哨裏。他自以為來頭不同，氣魄很大，說話向來不檢點。正目就和他說：『你的皮襖沒了，只怪你自己不小心，爲什麼要我賠償？』王某見他說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，大怒道：『你憑什麼當老總？』結果兩個人大吵起來，幾乎動武。後來相持不下，哨官知道了，立時召集大家講話。哨官對大家說：

『我看出是誰拿了東西了。我說就是你，快拿出來吧！』

這原是嚇詐的法子，心想誰要是偷了東西，聽見這話，心裏驚慌，一定會自己出來招認的。但結果竟然沒有效，一點點破綻也看不出來。於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裏的伙役小孩講話，仍然使用那個詐法。這次却奏了效，正說到「我看就是你」這一句話時，一個小孩子就嚇得渾身哆嗦，一經追問，他就一一招供了。他說皮襖是他偷的，放在

他哥哥開的茶館裏的一座風箱下面。當即派人到那裏去找，果然找了出來。從前多次丟失的東西，他也一一承認是他偷的。案子查出來了，過去疑神疑鬼的人，此時再也不做聲了。可是被嫌疑的兩個弟兄却大罵起來：『真不閉眼，看着我們吃零嘴，就說是我們偷東西！冤枉好人，真他媽的不閉眼！』罵了幾天，沒人出頭計較，一場風波才算平靜。沒有半點證據，就憑空猜疑某人偷竊，實在太不對了。小說上有個故事，說一個樵夫上山砍柴，半途上把斧頭丟了。這時他看見另一個人在那裏砍柴，他就疑心是那人的偷的。看看那人的眼睛，也像個賊；看看那人的鼻子，也像個賊；只差沒有實證，不好明指。後來他在河邊把斧頭找着了，回來看看那人，眼睛也不像賊，鼻子也不像賊，處處都像個好人了。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。所以無故猜疑，最須切戒。這次幸虧偷東西的人終於查出來了，要不然，說不定就會逼出什麼大亂子來的。

我們在獨流鎮住到月底，又奉令開往楊柳青。

第七章 副目 哨長 隊官

楊柳青靠近小清河和運河，土地特別潮濕，石舖的街道也很窄狹，到處都是污泥。地方上雖有些大財主，可是對於這種公益的事業，誰也不去關心。我們在這裏住不到一星期，袁世凱派了人來挑選小隊子。出我意外的，哨官竟把我藏了起來。我參加挑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。那時充當一名小隊子，餉銀每月十兩八；一個普通兵每月才四兩八，相差一倍還多。這事我委實萬分不高興。這次挑選的結果，同伴中比我個兒矮的也被挑走了。我要是能參加，一定也可以挑得上的。我覺得這是官長惡意拿捏我，一時心裏很是氣憤。後來我回頭想想，才知道這是我的誤會。他們那麼辦，原是另眼看待我，有意要留下我的，因為那時在同伴中，要算我最爲用功。我們在楊柳青，租住着民房，大家都在地上打草舖。我因為要讀書練字，特意買了一隻箱子，坐在地舖上，就用箱子當做桌子，每天利用餘暇，埋頭讀書寫字，自己覺得非常自在，進步也很快。營中的功課，最注重野地實習。經常分成小隊，練習猝然遇敵的戰法。每天操演的陣勢，和官長的說明，教訓，回來我都統統記下來，自己又加以研究，得益實在不淺。營長和哨官看見我努力的情形，又知道我會喊操，就暗中特別看重我。有時叫我喊一哨的操，有時叫我喊三哨的操，有時我們全隊的人，都交給我喊。他們的意思，是早就準備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。不過我那時一心一意，只想拿那十兩八錢銀子，心

想經濟寬裕一點，可以把我父親接回來同住。所以他們的用意，我根本沒有去了解。

九月初，隊伍又奉令開往韓家墅，離天津整整二十里。到韓家墅後，隊伍暫時住在帳棚裏，同時即動工蓋造營房。十月尾上天氣冷起來，河溝裏已經結了薄冰。營房的蓋造，須我們自己現拖坯，都是幾個人合在一起併伙做。因為沒做過這工作，便自告奮勇，擔任了在坑裏取水的工作。在晌午陽光正暖的時候，這個工作還不怎樣吃苦，可是早晚溫度低冷，站在坑裏，先要鑿冰，而後才可到水裏去取水。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。這樣工作了一個時期，我的下腿遂受了寒；到而今，每到初冬，兩腿便隱隱作痛，就是這時種下病根的。

不久，保定府籌辦二十營大規模的擴軍，新軍的官長，很多是由武衛右軍挑選去擔任。我之升爲副目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。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。因為每連共計六棚，每棚十二人，合計要在七十二個正兵中挑選一個副目。至於正目就比較容易升，因為競逐正目的只有六個副目。

我升爲副目，頭棚裏的士兵都不是很高興。因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。他們認爲我經歷太淺，沒有資格當頭目。正目丁守富也和我處得很不好。這人一個大字不識，操法也不懂，但是却會千方百計的同我爲難。那時棚子裏有兩個兵——一個姓劉，另一個姓陳——正生着傷寒病，渾身發燒，鼻孔流血。就在他們這樣重病的時候，丁守富常常站在旁邊，手裏玩弄着皮帶，嘴裏嘮嘮叨叨對他們亂罵：『賤骨頭，好吃零嘴，不小心，自己作了自己受，活該！』如此這般，麻煩不已。他的面貌生得很醜，嘴唇特別厚，望上擡着，如同豬嘴一樣。因此大家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

做「老豬精」。老豬精罵人時候，嘴唇益發癢得厲害，臉子也更加顯得難看。他常常對他們罵着，越罵越厲害，越罵越生氣。我在旁邊望着，實在有點看不過。有一次我就說：「他們生病，你應該侍候才對呀！你天天只會罵，難道他們的病罵得好不成？」丁守富聽了火上加油，接過來就同我吵罵起來。我一時按不住心頭火氣，跳起來把他按倒，照他身上打了幾十拳。丁守富就大聲的嚷起來。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，把我們叫到跟前，問什麼事。丁說：「副目馮某打我。」李哨官問我說：「你爲什麼打他？」我說：「你叫他自己說。」丁守富說：「我只罵了兵兩句，他就打我。」李哨官把兩個生病的兵叫出來，兩個兵就大哭，說正目如何虐待他們。李哨官知道了原委，鼻子裏哼了一聲，罵了守富說：「打的好，該打！」同時也申斥了我幾句。從此以後這兩個兵的湯藥屎尿，一概由我照應料理，一直伺候了兩個月，他們的病才好。這事不但兩個兵感謝我，就是全棚子裏的士兵，也受了很大的感動，對我的感情一天一天的好起來。不久，全哨的士兵知道了這事，不約而同的對我生起敬愛之心。此外還有一件事，也給我很好的教訓，我也在這裏順便一述。

韓家墅有一個姓馬的大財主，擁有十幾頃地，街上開有一座大雜貨行。有一天那兩個生病剛好的士兵上街買東西，在雜貨行門首遇見馬先生。馬先生和他們原是熟識的，就問他們倆爲什麼好久不上街。兩個兵說是病了，並且將經過的情形也告訴他。馬先生聽見我打抱不平，以及細心看護他們的事，心裏十分高興，說：

「你們的副目是什麼樣的人？我倒沒有見過。」

「我們副目個兒頂大，搵法好，極用功，他不大上街。」

「你們想法子介紹我見見他不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兩個士兵回來，就將上述的經過說給我聽，並且堅持要我上街會見馬先生。我當時笑了一笑，我說我不去。兩個兵很失望，百般央告我無論如何要我去一趟，纏得我實在沒辦法了，只好答應去。

馬先生爲人很誠懇，待人接物也都很好。我們相識不久，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。那時他已四十多歲，我却是個青年。我說我是個營混子，你同我拜把兄弟，可要辱沒了你。但是他堅持要拜，我也未再拒絕，於是就結爲異姓兄弟。後來我當了哨長，把父親接了來，一時沒有找到適當的住處，就住在馬先生家裏。馬先生全家對我父親都很親熱，招待得如同他們自己的老人一樣。一九二四——二五年，我在南苑駐兵，曾把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，新近他才故去的。

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四月，我升爲四棚正目，十二月中旬，又被提升爲第二營右哨哨長。

新升的官長同舊官長容易鬧意見，這差不多是軍隊中的一個慣例。這時右哨哨官齊振標，是從袁世凱的小隊子裏升上來的，因爲他的尾把粗，來頭大，所以雖然一個大字不識，氣餒却極高，張口就罵人，練操的時候，就是他罵人的時候；那些下流字眼，字典裏都是找不到的。有一天在操場裏下操，因爲士兵動作不整齊，他抓住了這個題

目，就破口大罵，罵得人家簡直沒法受得了。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，氣也不敢出，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視着。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，看見這光景，我就對齊振標說：『咱們練兵，只是罵可不成，要是罵能練好兵，那咱們就不必下操了，專門來罵好了！』齊振標聽了我的話，惡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接着就說：

『我是哨官，我有權罵人！』

『你有權練兵，你沒權罵人！』

操場裏的士兵，看見我們吵起來，都唧唧咕咕的嚷：『打打打！』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。我一時性起，拔出刀來，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；他一看不好，回頭就跑。他跑，我追，像這樣繞着操場跑了一大週。後來他跑出操場，到騎兵王統領那裏去告狀，我也跟着追了去。見了王統領，他告我以下犯上，目無長官。我說：『不管犯上不犯上。先要論誰有理誰沒理。』王統領外號叫做王蛤蟆，和齊振標同是小隊子出身，他說：『不問什麼理不理，我要先打了再說話。』當時齊振標罰了跪，却把我按倒地上，打了二十軍棍。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，請我們倆去吃飯，叫我們消釋意見，言歸於好。

我當副目不久，就和正目打了一架；剛當哨官，又打哨官。現在回想起來，覺得當時這種行爲，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，一般都是是一種義憤，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。後來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我從滌平班師，發動「首都革命」，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。

光緒卅一年（一九〇五）武衛右軍奉令離開韓家墅，開往南苑駐防，改爲第六鎮。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，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標第三營前左兩隊。我也由哨長改任司務長。

改編以後，一切都採用新軍的辦法，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。那時統制是段祺瑞，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，十二協是何宗廉，標統是王化東。王化東文武兼長，文筆固好，軍學也研究的不錯；並且爲人態度誠懇，勤於訓練，這算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遇着的好長官。

我們在南苑訓練，每日官長目兵都上講堂，學術兩科並重。段祺瑞對於官長頭目的訓練，尤爲認真。一時全鎮空氣緊張，人人興奮。是年七月十三日，第三營後隊排長出缺，我便升補了上去。

一天，兩宮到萬壽山巡遊。第六鎮廿四標奉命在路上警戒。那驕貴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門不遠，不想有一個賊寇的百姓，因爲不能接近，化裝了衛隊的樣子，戴着紅纓帽，混了進來，等到兩宮駕到，就衝到轎子前面大聲喊冤。慈禧太后吃了一驚，幾乎從轎子裏衝出來。於是太后大發威風，立即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，標統和管帶的頂帶摘去，段祺瑞也記了一次大過。這樣一來，隊官降爲排長，各方紛紛保荐人去補這個缺。因爲保荐的人太多了，無法決定取捨，乃舉行考選，以昭公允。

這次考選，有四團十二營，共計四十八連，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。結果我竟僥倖考取了第一，當升爲廿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。

我升爲隊官後一個月，我父親即患肺疾，晝夜咳嗽，痰中微帶血色，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，總是不見功效。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。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，醫術很精（現在徐州開醫院）但診治月餘，依然不見起色。延至十二月十五日，即溘然長逝。父親北來不久，我即遭此大故，真是悲痛萬分！他老人家一生顛連艱苦，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。如今我稍能殺水承歡，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。這爲我留下一生永難忘懷的遺痛！

父親的喪事辦完，靈柩暫停離雨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廟。那時南苑圍牆內不許停厝棺柩，因此隔了兩個月，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，安葬到安徽義地裏。這時已是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了。

我當第二營隊官，本營管帶名叫回富興的，爲人忠厚怕事，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，不是一個有爲的人。平素他認爲官長不可信賴，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，到各隊中監視，這是他帶兵的秘訣。我奉領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，就是他派了來的。因爲他偷東西，被我查明，立即把他開除。他就回去見回管帶，於是回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。我當時非常氣憤，戴上了帽子，拿着刀，就去見回管帶。見了面，他說：『張頭目犯了錯，你應當教導他，使他學好才是，開除是不可能的。』我說：『這種害羣之馬，非剷除不可，像他這種人，不但擾害別人，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。如果不辦，將來隊伍裏什麼事都不能辦了。』說着我把帽子摘下，連刀一起扔到回富興的懷裏，回頭就走。同時一邊走，嘴裏還氣忿忿的這樣說着：『能給好漢子牽馬墜蹬，不給賴漢子當祖宗。』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

兒有一口井，剛走到這兒，患病的那個兵，一時氣急心窄，忽然向井裏跳了進去。大家見狀大駭，急忙打撈，幸而人多手快，沒有出事。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嚷開了，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。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，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，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。

第二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慎重選擇，萬不可濫竽充數。有一天我檢查內務，發現六棚有一個士兵名叫褚懷軍的，身染時疫，於是立即派人請軍醫長來看病。軍醫長來到，診完脈，一付藥吃了下去，當即把那個兵打發了。當時那兵斷了氣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只聽見他吃下藥去，直嘔肚子疼，以後就再也沒做聲。大家都以為他睡着了，等到出早操的時候，協統跑來查營房，大家急忙整束內務，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床，喊了半天，不聽見聲音，走近去一看，原來早已沒氣了。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——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，外號叫催命鬼——我問他：『好好的——個兵，不過生了點小病，你一付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？你這是怎麼治的？你這算什麼醫生？』催命鬼聽我質問後，竟這樣回答：『我是治病，可治不了命！』吵了半天，也沒有結果。我就說：『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，哼……』那時軍隊中用人，大多憑靠親戚關係，濫任私人，學識能力，往往不大管的。下級官長和士兵氣忿不平，也只好悶在肚子裏，無可奈何。

清末，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，位職很高。這時任軍學司的是馮國璋。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，忽然上了個奏摺。大意是：行伍出身的只能當到司務長為止，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。

消息傳到各處，隊伍中立即沸騰起來。我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：第一，其時軍官學校太少，而且開辦不久，一時訓練不出那麼些畢業生；以畢業人數論，平均一營也派不着一個。事先沒有詳細的計劃，就冒然提出這樣的建議，搖動軍心，不能不算是失着。第二，奏摺的用意，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，根本沒有給窮人設想，因為能上軍官學校的，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，和皇家權貴的親戚。並且升入陸大，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，試想窮苦人家子弟，如何有此能力？這奏摺雖然沒有立即施行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，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，並且進而遷怒於昏庸的清廷。

我的生
活

(第一册)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實價國幣二角

著作者 馮 玉 祥

發行人 陶 亢 德

發行所 字 宙 風 社

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
四號電話八五六四五

印刷所 中國科學公司

